

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陕西宗教建筑——教堂建筑研究

专 业：建筑历史与理论

研 究 生：胡 婕

指导教师：杨 豪 中 教 授

论文摘要

陕西的基督教堂建筑随着基督教在陕西的传播，经历了 1300 多年的发展变化过程。特别是明清至近代以来伴随着西方传教士在陕西的传教，曾在陕西建造了大量的教堂，为我们研究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陕西宗教建筑提供了实物依据。

此外，由于在专业领域内对陕西教堂建筑的专门性研究目前还属空白，陕西教堂建筑的研究可以弥补目前在这方面研究的缺乏，促进这一研究领域中的发展，并对相关领域的研究的发展有所帮助。因此，对陕西教堂建筑的历史沿革、现存状况和建筑型制进行系统而又深入的研究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能性。

论文以陕西教堂建筑作为研究对象，首先通过对相关资料的收集和考证，对陕西教堂建筑的历史沿革、发展过程、分布状况和形制进行考证和论述，试图对陕西基督教堂建筑进行较为全面和整体的论述。其次，从中选取几个比较典型的建筑实例进行实地调研和测绘，以第一手的实际资料为主，利用相关文献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与论证。通过研究它们的历史沿革和建筑形制，对陕西教堂建筑的基本状况和建筑形制特征进行研究总结。在此基础上，通过对陕西与国内其他地区教堂建筑的比较，探讨了陕西基督教堂在建筑形式以及建筑材料与结构技术方面的特征。然后论文进一步探讨了陕西教堂建筑所体现的受异域文化影响的特征及其在建筑、城市、文化与社会生活等方面所具有的影响。

最后，本文对陕西教堂建筑的历史发展状况进行了总结，概括了陕西教堂建筑所具有的特征，明确了陕西教堂建筑的价值与意义，提出和探讨了今后对教堂建筑进一步研究的设想。

关键词：陕西·基督教·教堂·建筑

A Study on the Religious Architectur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hristian Culture —— Churches at Shaanxi Area

Specialty: Architectural history and theory

Graduate Student: Hu Jie

Instructor : Prof. Yang Haozhong

ABSTRACT

Along with the dissemination of Christianity in the past 1300 years, the churches at Shaanxi area had undergone a long process with great changes and developments. Especially in lately 200 years, there had been a large number churches been built up by the western ministers in order to disseminate Christianity. On the actual basis provided by these buildings, we can do such a study on the religious architectur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hristian culture at Shaanxi area.

In addition, owing to the insufficient research work in this area, a study on the churches in Shaanxi not only will fill the gap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t, but also will be helpful to other research works related to this field.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and possible to have a systematic and deep study on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s and changes, the present conditions and the architectural styles of churches in Shaanxi.

This paper researches into the religious architectur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hristian culture at Shaanxi Area. This is not only a collec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materials for the churches in Shaanxi. Further more, on the basis of this ,the paper tried to sum up some specific features and find the reasons of this by the use of the researches on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s and changes of architectural styles of churches in Shaanxi. Such a study will provide some basic research materials for better preserving and researches of the churches in Shaanxi.

Firstly, by means of the collections and textual researches to the related materials, this paper tried to make a whole description on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s and changes, the present conditions and the architectural forms of churches in Shaanxi. Secondly, the

paper selected several typical churches as examples to investigate and survey on the spot. By the use of the first-hand and other related materials to analyse and summarize on the developments and changes, the present conditions and the architectural forms of churches in Shaanxi. Then, base on the comparison between Shaanxi and other areas in China, the paper discussed the specific features on the architectural style, material, structure and technique. Following that the paper made a further discussion on the features which reflects influence of foreign culture and draw a conclusion on the influences to the architecture, urban ,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society at Shaanxi area.

Finally, this paper sum up the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s and changes and the features of the churches in Shaanxi. Further more, points out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t of it, discusses on some ideas of further study on the religious architectur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hristian culture at Shaanxi area.

Keyword: Shaanxi • Christianity • Church • Architecture

声 明

本人郑重声明我所呈交的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本人或其他人在其它单位已申请学位或为其它用途使用过的成果。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所有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致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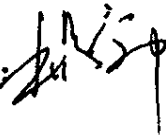
申请学位论文与资料若有不实之处，本人承担一切相关责任。

论文作者签名：胡婕 日期：2003.6

关于论文使用授权的说明

本人完全了解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学校可以公布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者其它复制手段保存论文。

（保密的论文在论文解密后应遵守此规定）

论文作者签名：胡婕 导师签名： 日期：2003.6

注：请将此页附在论文首页。

1. 绪 论

1.1 课题研究的目的是与意义

教堂建筑在建筑史特别是西方建筑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国的教堂建筑在建筑史上也占有特殊的地位，尤其是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中国近代教堂建筑是正统欧洲建筑文化传入中国的重要领域，尤其是在近代早期。1998年版的《中国现代美术全集 建筑艺术编》第一卷（近代建筑）中列举了现存的153件优秀近代建筑，其中教堂14件，占9%。在中国近代主要城市中，教堂往往是该城市或地区内最具艺术价值、最具有标志性的近代建筑。

陕西的基督教堂最早出现于唐贞观年间（公元635年），古代基督教首次传入中国，并在长安建造了中国第一座基督教堂。自此之后，随着基督教与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几度兴衰，陕西的教堂建筑也经历了1300多年的发展变化过程。特别是明朝末年以来，天主教在陕西的传播；以及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新教大规模的传入陕西，在陕西建造了大量的教堂，其中有一部分保存至今。这些保留下来的教堂建筑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实物依据，因此对陕西教堂建筑的历史沿革、建筑型制和现存状况进行系统而又深入的研究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能性。

陕西在中国历史和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史上所具有的重要而特殊的地位，使得陕西的基督教堂建筑在异域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双重影响之下，形成了一些独特的建筑特征。这对于陕西建筑，尤其是近代以来的陕西建筑造成了技术、观念等多方面的影响。

因此，本论文以陕西教堂建筑作为研究重点，不仅只是对陕西基督教堂建筑资料的收集介绍，更重要的是通过研究它们的历史沿革和形制发展状况，概括总结出陕西教堂建筑所具有的一些建筑特征及其渊源，并对陕西教堂的建筑形制进行研究总结，目的在于为陕西教堂建筑的保护与更新提供一些基础性的研究资料。这是建筑史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有助于对陕西建筑发展变化成因及其发展趋势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1.2 课题研究的现状

在国外，尤其是在欧洲，基督教堂建筑作为一种极其重要的建筑类型，其相关

的研究一直都是建筑研究领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我国，随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近代建筑研究的逐渐重视，教堂建筑作为近代建筑中的一个重要类型，其相关研究也逐渐增多。其研究方向也从原始资料积累的基础性研究转向保护、利用等综合性研究。如清华大学、同济大学等科研单位对北京、上海、哈尔滨、苏州等地区的基督教堂建筑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但是其中大多的研究不是对教堂建筑的专门性研究，而是把教堂建筑作为近代建筑中的一个重要类型进行研究。其研究的对象也主要集中在近代以来受外来建筑文化影响较早也较多的沿海、沿江（长江）、沿边（边界）地区。如《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杨秉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讨论会论文集，（1—5）》（汪坦、张复合主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中国近代建筑总览》（汪坦、藤森照信主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等专著和文章中都对教堂建筑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同时，也有一些对教堂建筑的专门性研究。如同济大学路秉杰教授的文章《上海的教堂》（新建筑，1986/3），同济大学倪群的硕士论文《上海教堂建筑研究》（1989）等。

目前，国内外有关陕西地区教堂建筑的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与其相关的著述散见于地方史志、考古文献等各种典籍之中，多为对建筑的单纯记载及其历史变迁的纪录。在建筑专业方面的论述很少，仍存在有许多不明确和尚未涉及到的问题，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很有有限。在专业领域内对陕西教堂建筑的专门性研究目前还属空白。有鉴于此，笔者确定以教堂建筑作为研究对象，希望通过本人的努力能促进这一研究领域中的发展，并对相关领域的研究的发展有所帮助。

1.3 课题研究的方法

在了解了目前学术界对教堂建筑的研究现状以后，笔者的研究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本论文通过对相关资料的收集和考证，对陕西教堂建筑的历史沿革、发展过程、分布状况和形制进行考证和论述，试图对陕西基督教堂建筑进行较为全面和整体的论述。另一方面，由于陕西地区现存一些具有一定历史价值、研究价值和代表性并且保存至今还基本保持原貌的建筑实例。因此本论文从中选取几个比较典型的建筑实例进行实地调研和测绘，以第一手的实际资料为主，利用相关文献进行较为深入的比较分析与论证。通过研究它们的历史沿革和建筑形制，对陕西教堂建筑的基本状况和建筑形制进行研究总结。进而通过陕西与国内其他地区教堂建筑的比较，探讨陕西基督教堂在建筑形式以及建筑材料与结构技术方面所具有的特征。然后又进一步探讨陕西基督教堂建筑所体现的受异域文化影响的特征以及

陕西教堂建筑在建筑、城市、文化以及社会生活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1.4 课题研究的组织结构

- 第一章 绪论。讨论课题研究的的目的与意义、课题研究的现状以及课题研究的方法。
- 第二章 基督教在陕西的传播历史及传播状况。本章讨论了唐代至元代基督教、明清以来的天主教以及近代以来的基督教新教在陕西的传播，明确了陕西教堂建筑的建造背景。
- 第三章 陕西教堂建筑的历史发展状况。本章讨论了唐代至元代的基督教堂、明清以来的天主教堂以及近代以来的基督教新教礼拜堂的历史发展状况与建造情况，对于陕西教堂建筑进行了较为整体全面的论述。
- 第四章 陕西教堂建筑实例研究。本章首先简要论述了陕西现存教堂建筑的情况，然后分别对部分天主教堂实例与基督教新教礼拜堂实例在建筑的历史沿革、建筑现状与特征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与论述。
- 第五章 陕西基督教堂建筑的特征。本章首先分别论述并总结了陕西与国内其他地区教堂的主要建筑形式与建筑材料、结构技术。然后在此基础上，运用比较的方法探讨了陕西基督教堂建筑在风格样式以及建筑材料与结构技术方面的特征。
- 第六章 陕西教堂建筑所体现的受异域文化影响的特征。本章从陕西特殊的文化结构体系、受异域文化影响是一个自觉于不自觉的过程以及外在受异域文化影响而不以改变的传统观念这三个角度探讨了陕西教堂建筑所体现的受异域文化影响的特征。
- 第七章 陕西教堂建筑所具有的意义。本章通过陕西教堂建筑本身、教堂建筑对于城市以及教堂及其所代表的西方文化所产生的影响的讨论，探讨了陕西教堂建筑在建筑、城市、文化以及社会生活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 第八章 结语。对陕西教堂建筑的历史发展状况进行了总结，概括了陕西教堂建筑所具有的特征，进一步明确了陕西教堂建筑的价值与意义，提出和探讨了今后对教堂建筑进一步研究的设想。

2. 基督教在陕西的传播历史及其状况

基督教发轫于犹太教,起源于公元一世纪的巴勒斯坦,逐渐流传于时处奴隶社会的整个罗马帝国,并于四世纪初定为国教,从此开始其向世界各地的广泛传播与发展。随着罗马帝国的分裂逐渐分化为东西两派,并于公元 1054 年正式分裂。东派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自称“正教”即东正教;西派以罗马为中心,自称“公教”即天主教。至公元十六世纪,西部教会发起反对教皇封建统治的宗教改革运动(马丁·路德宗教改革)陆续分化,称“新教”,它以路德宗、加尔文宗为主。后内部又逐渐分化,形成诸多派系。^[1]

自从基督教在公元 635 年初次传入长安,基督教在陕西的传播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变迁。这其中可以分为:唐代至元代基督教的传播、天主教的传播以及基督教新教的传播三个大的历史阶段。第一阶段经历了从基督教在唐代的初次传入、兴盛、衰微以及在元代的再度兴起与衰亡;第二阶段经历了天主教在元代的初次传入以及明清以来正式的大规模的传入;第三阶段经历了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以来基督教新教各教派在陕西的大规模传教活动。可以看出,这三个历史阶段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相互衔接,甚至有些部分是并行的。

2.1 唐代至元代基督教在陕西的传播

基督教传入中国,传说早在隋唐(公元 581—618 年)以前,但据历史记载,确实年代应该是公元 635 年,亦即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九年。在此以前,传说多马(耶稣十二使徒之一)曾到中国;又有东方教会两位教士在公元 500 年,即北魏宣武帝景明元年,到过洛阳都城;另有最早提到基督教传入中国的罗马作家阿诺比尤斯(Arnobius),在其所著《驳异教者论》一书中指出,公元三世纪(汉献帝建安年间)基督教已经传入中国。在我国明朝中后期来东方和中国的天主教教士中,有许多人认为:第一个把天主教传入中国的,是东汉时期耶稣的 12 宗徒之一的圣·多默,即多马传入说(见《Moun menta》v01.1 第 407—414 页)此外还有巴多罗马传入说、基督徒逃难说、叙利亚传教士传入说、三国孙吴时传入说等等说法。^[2]但

^[1] 威利斯顿·沃尔克(美):《基督教全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11页,1995

^[2] 姚民权、罗伟虹:《中国基督教简史》,宗教文化出版社,第5页,2000.11

是由于没有确凿的史料和实物作佐证，故难视为信史。除此以外，还有其他的种种说法，但是都无史籍可靠。

根据史籍《唐会要》四十九卷记载：唐太宗贞观十三年（公元638年）七月诏令，“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集群生。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教，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词无繁说，理有忘筌。济物立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廿一人。”这个诏令和《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立碑。明熹宗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在陕西出土。）所记相同。该碑刻于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据碑文记载，方知真正把天主教基本教义传入中国的，是波斯人的聂斯托利派^[3]主教阿罗本。

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阿罗本偕同道数人抵达长安，受到热情礼遇。唐太宗李世民命宰相房玄龄总仗西郊，迎宾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深知真正，特令传授”。并于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下诏，允其建寺度僧传教。建于长安义宁坊的景教寺院初名“波斯寺”，玄宗天宝四年（公元745年）改为“大秦寺”。“大秦”之名始见于《后汉书·西域传》指的是罗马。这一名称的改变，反映了唐人世界知识的增进。由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作为中国古代基督教的重要历史物证，人们才确认基督教在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就传入长安。

唐代（公元618—907年）二百八十九年，长安是唐王朝的国都，不但是全国政治经济的中心，也是中外文化和交通的中心，盛时人口一百多万，人物荟萃，极为繁华。基督教东方教会从叙利亚进入波斯王国（今伊朗），以及阿拉伯、印度等地，更由波斯东传中国。其传入的主要原因，还不仅在于政治和文化方面，更重要的在于经济方面。中国与波斯之间，自西汉至唐朝八百年间，即已开辟了交通路线——“丝绸之路”，便于外国使臣、传教士僧徒、商人驼队等，均可以由西到东。唐太宗贞观之治，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达到了封建文化的一个顶峰。他在宗教上采取“兼容并蓄”的开明政策，对儒、释、道三教是并重的。从波斯传来的基督教称为“景教”，此外还有波斯的摩尼教、祆教（拜火教），均一视同仁，为之建立波斯胡寺。到唐高宗时（公元651年），“大食”（阿拉伯）派来朝贡使和商旅，输入“伊斯兰教”（穆护）。于是亚洲四大宗教——佛、道、耶、回，集中到长安。

中国古代基督教，在唐代称为“景教”，当时全国景教的中心大主教区，就设在长安。“景教”这个名称，就是“正大光明”的意思。^[4]但景教初传入中国时，

^[3] 聂斯托利派出自叙利亚的东方教会，总部在波斯国的巴格达（今属伊拉克）。

^[4] 阜新平：《基督教犹太教志》（《中华文化通志·第九典·宗教与民俗》），4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0

唐人称之为“波斯经教”，把景教礼拜堂称为“波斯胡寺”，后改名为“大秦寺”。把景教徒和佛教徒并称为“僧”。甘肃敦煌石窟发现的景教文献，也多用佛经语句。教堂称“寺”，教徒与教士称“僧”，“大德僧”则为主教和大主教。这虽然不利于景教的传播，但并未失去景教的独立个性，他和西来的佛教以及波斯教完全不同。

唐代景教曾有过三次高潮，初次为高宗时（公元 650—683 年），阿罗本因功晋升大主教（镇国大法师）；第二次为公元 744 年佉和至长安，于兴庆宫宣讲景教法理，改称波斯寺为大秦寺；最后一次为伊朗随大食、回纥军入援平安史之乱，在郭子仪军中任谋士，陇西、河西一代景教为之一振。在唐武宗灭佛（公元 843 年），景教同时被禁，景教徒聚集广州一地。公元 878 年黄巢攻入广州，驱杀外人。景教在唐代倍受尊崇，高宗时“法流十道，寺满百城”。肃宗时的景教僧波斯人伊斯曾在唐王朝任“金紫光禄大夫”试殿中监等职。公元 635 年至 845 年的二百多年中，景教在中国的势力颇大，相传房玄龄、郭子仪皆为其信徒。但到了武宗登基后开始大肆迫害佛教，连景教也受到波及，朝廷“勒大秦穆获沃二千余人还俗”^[5]，从此景教在中土归于沉寂湮灭。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景教在内地归于沉寂，但并未消失。

其实，在残唐五代（公元 907—959 年）和宋、辽、夏、金（公元 960—1278 年）统治时，景教在内地各省遭受破坏，但并未绝迹。而在蒙古、新疆等边远少数民族地区颇为发展。景教在当时的北方地区获得了西辽的宽容，于是在唐代禁教以后，基督教在中国北方重新抬头。辽至元年间，基督教是中国西北草原游牧民族主要的宗教信仰之一。

古代基督教在中国的第二次传播盛行于元朝，随着蒙古人南下中原，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北京，基督教在中国内地重新出现并又获得了特别的发展。元时流行的基督教分为两大流派：其一是唐朝武宗“灭教”后曾在中原绝迹，却仍流传于西北边境如内蒙古等地的景教之复兴，以及中亚景教的再次东来，代表东方教会的传教活动；其二是罗马天主教会的首次来华传教，尤指方济各会修士在华布道建堂之举，代表着西方教会的传教活动。元朝入华的基督教被统称为“也里可温”，其东、西教会之别并不突出。

元世祖入主中华，基督教再次传入中国。蒙古人呼基督教为 Arcoun 名之为也里可温。清人洪均考证道：“也里可温为天主教，有镇江北固山下残碑可证。自唐时景教传入中国，支裔流传，历久未绝，也即景教之遗绪”。^[6]在《元史·职官列

^[5] 见《唐会要》第 49 卷

^[6] 见《元史译文证补·元世各教名考》

传》中也记载了其时基督教已遍及全国的情况：北方如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直隶等省，南方如广东、云南、江浙等省，皆有也里可温教信徒居住，并建有供礼拜之用的教堂（十字寺）。就连元世祖忽必烈的母亲别吉太后，也都信奉了也里可温教，并成了一位虔诚的教徒。

元代皇帝对也里可温信徒十分优待，常免除租税徭役。朝廷还设置崇福司，专门管理也里可温十字寺祭享等事。顺帝初年（公元 1333 年），顺帝还与罗马教廷书信使节向往还。直至元末农民大起义推翻蒙古人的统治时，盛极一时的也里可温教也就随之失却了立足之地，再度趋于式微。元朝蒙古贵族多信奉景教，其中皇太后唆鲁火帖就是著名的景教皇后。忽必烈封三王子忙哥刺为安西王，建立安西宫城（今西安城东北，浐河西岸高坡有遗址俗称达王殿），其中建立华丽景教寺。从此景教流行于安西路。安西路后改为陕西行省治所，又改为奉元路，景教绵绵不断。

忽必烈执政期间，景教在甘州、宁夏、天德、西安、大度等处都设有主教区，其主教驻地“掌教司”数目达 72 所之多，反映了元代景教曾有过的繁华景象。在陕西，刊有“也里可温”之名的元代碑石，如户县祖庵镇重阳宫、凤翔县长寿观等共计 14 处之多，足证“也里可温”教曾在陕西广泛存在，确是无可置疑的事实。

元朝的也里可温教包括景教和天主教仅靠蒙元统治上层的厚待和支持来维系其存在，因此只是浮在中国社会的表层而未曾对之产生过深刻的影响。随着元朝的衰落及覆灭，基督教当时在中国赖以生存的基础也随之消失。1368 年，明朝取代元朝，明太祖朱元璋明令禁止基督教的传播，蒙古人及其信徒官员已北逃塞外。因此，基督教在中国内地亦随之消失，再无踪迹可寻。基督教第二次来华传教的努力被彻底断送。

2.2 明清以来天主教在陕西的传播

明清之际，天主教传教士在华活动标志着基督教的第三次东来。此时，西方基督教在走过中世纪漫长发展之后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爆发使原有的天主教世界一分为二，传统罗马教会的势力减弱。天主教以“欧洲所失，海外补回”为口号，将海外传教作为其振兴教会的一项重要措施。从此，基督教开始传播到世界各地，并真正成为世界性宗教。^[7]这时，天主教各修会成为其海外传教的主力。耶稣会、方济各会、多明我会等相继来华传教，由此直接构成了基督教在中国的第三次传播。

^[7] 黄心川：《世界十大宗教》，上海，东方出版社，213-214 页，1996

罗马教会于元朝时首次传入中国。公元 1245 年，方济各会修士柏朗嘉宾（Giovanni de Piano Carpini）等三人携教皇书信来与蒙古修好，开了罗马教廷与蒙古通使之端。1264 年，元世祖忽必烈入度燕京，改元至元。从此，西方天主教徒和传教士亦随蒙古人而得以进入中国内地。1289 年，意大利方济各会修士约翰·孟德高维诺（Giovanni de Montecorvino）作为教廷使节前往中国，从而成为天主教来华真正开教的第一人。^[8]

明天启二年（1622 年），陕西泾阳人王徵赴京考中进士期间在京受洗加入天主教。明天启五年（1625 年）王徵邀请天主教耶稣会士金尼阁（法国人）来陕传教，使天主教在陕西得以传播。明天启五年《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出土于陕西，消息广传，中外震惊，遂引起世界各国名流、学者、教士的兴趣和关注，视如至宝，以亲目为快。前来观光的南怀仁、汤若望、方德望、鲁德昭等人。影响所及，对天主教的兴起和发展，有重大的推动作用。^[9]

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 年），陕西天主教主教区成立，总堂先设在泾阳县鲁桥镇，后移至西安土地庙什字。天主教在近代大规模的传入陕西，是从鸦片战争之后开始的。道光二十四年（1844 年）中美望厦条约签订后，冯尚仁为陕西区主教兼督甘肃教务，他选购高陵县通远坊土地为建立总堂基地。此后又有意大利人林奇爱负责陕西和新疆两地教务期间，在西安城内土地庙什字修建天主教堂，并从欧洲邀请来一批方济各会圣女传道会的修女，在妇女中进行传教。

清光绪十三年（1887 年），陕南天主教由陕西主教区划出，成立汉中教区。1911 年成立延安教区，1928 年成立安康教区。30 年代先后成立了西安、三原、周至、凤翔、大荔五个教区。1949 年底，陕西共有天主教区 8 个，信教群众 11.6 万多人，神职人员 500 余人，教堂 372 座。1949 年 10 月后，陕西天主教界爱国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积极开展了反帝爱国运动，摆脱了罗马教廷和帝国主义的控制，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1962 年，陕西省天主教爱国会成立。1979 年以来，先后自主选出了 5 名主教以及一批神甫，成立了陕西省天主教教务委员会，开办了陕西天主教神哲学院。^[10]

迄今为止，陕西现有西安、周至、咸阳、渭南、榆林、凤翔、汉中、安康 8 个教区，全省现有天主教徒 28 万多人，其中主教 8 位，神父 256 位。并建有神哲学院 1 所，备修院 1 所，修女 600 余人，开办诊所 75 余所。此外，还修复教堂 300

^[8] 穆尔（美）：《1550 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郝镇华译，132-134 页，中华书局，1984

^[9] 李伯毅：《陕西省天主教历史述略》，西安政协，38 页，No. 207, Vol. 38, 2002. 1

^[10] 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志》，23-24 页，中国地方志丛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 8

余座。^[11]

2.3 近代以来基督教新教在陕西的传播

近代以来基督教的传播主要发生在 1840 年鸦片战争前后。在 1840 年之前，天主教会以地下传播的方式维系着其在华的生存。基督教的另外两大派系：东正教和新教，亦相继传入中国，形成一定的基础和影响。但因此期间清朝教禁仍然较严，教会活动或明或暗、时隐时现，未能构成强大的发展势头。1840 年后，随着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中国长期闭关自守的大门，以及各种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强行解除了清廷长达百年之久的教禁。基督教新教各派各差会开始了公开而大规模的在华传教活动，天主教各修会亦重新派遣了大批传教士入华传教，俄罗斯东正教也从北京、东北进而深入到内地开展范围广泛的传教活动。由此形成了基督教第四次来华传教的高潮。

清光绪二年（1876 年），英国内地会传教士鲍康宁与金辅仁来陕传教。他们通过开办学校、医院和慈善事业，传播基督教。光绪十一年（1885 年）英国浸礼会牧师莫安仁、敦崇礼及邵涤源在西安城东关长乐坊东新巷内设立差会，建立了西安第一座基督教新教教堂（耶稣堂）。^[12]此后，欧洲、北美各国基督教新教各教派和传教组织均派传教士相继而来。

总的说来，近代基督教新教传入陕西的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 1890 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抢掠、火烧圆明园，迫使满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直到抗日战争前期。在这期间，外国传教士凭借不平等条约中的传教特权，分南、中、北三路进入陕西境内进行传教活动。

南路—以湖北省武汉市为据点，沿汉江逆流而上，现有英国伦敦会传教士于 1875 年进入陕西安康传教；接踵而来的是戴德生的内地会，于光绪二年（1876 年）派遣内地会传教士鲍康宁与金辅仁等经安康到汉中陕南各县设堂传教；又有传教士由南郑北上到凤县、宝鸡、凤翔一代传教。1900 年挪威宣教士王耀基，从汉口进入商洛地区，建立内地会、教堂传教，后改成美国基督教宣义会；1900 年，美国内地会车步云牧师到安康城西关建堂传教。

中路—先后有五个宗派差会进入陕西省关中地区传教。(1)是英国浸礼会牧师莫安仁、敦崇礼、邵涤源等于 1885—1887 年，先后从太原市入陕，先经三原县后又

^[11] 出自陕西省天主教爱国会内部资料

^[12] 李因信：《西安市基督教会历史简编》，西安市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231 页，1988.7

来到西安市东关建造救世堂传教。(2)是美国北欧教派组织的内地会,瑞典籍牧师傅认颂等,1892年从上海来西安成立“协同会”,在西关正街建堂传教。(3)由瑞典一个教派所组成的“瑞华会”,1894年由山西运城派遣传教士符励恺等渡河到陕西大荔设堂传教,成立“陕西信义公会”。(4)美国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于1915年来西安。(5)美国的“安立甘会”1916年来西安成立“中华圣公会陕西传道区”。

北路一有美国差会组织的“基督教华北公理会”于1917年先后由山西汾阳派传教士到陕北绥德、榆林一代传教活动。1900年,英浸礼会教士司穆德、武德逊等到延安传教。

第二阶段,即1937年以后,抗日战争期间,基督教其他大小宗派涌入陕西,有:美国浸礼会、美国以马内利会、美国传道会等。除此之外,还有中国信徒设立的如:信义会、耶稣家庭、基督徒聚会处、中华基督教自立会等其他大小教会。

截至1949年底,在陕外国传教组织已达20多个,全省共有基督教堂351座,信教群众约4万人,分布在70多个县(市)。1950年,吴耀宗等中国基督教上层人士联合发起“三自(自传、自治、自养)革新”运动,陕西基督教界积极响应,一万多名教徒签名拥护。这一时期,外国传教士和传教组织先后撤离。

1958年,成立了全省性基督教爱国组织“西安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从此基督教各个教派在相互尊重各自信仰和礼仪特点的基础上,实行了联合礼拜。1983年5月,陕西省基督教协会成立。截至1992年,全省现有基督教教牧人员170多人,信教群众14万人,开放宗教场所400多处,并开办了陕西圣经学校。^[13]

2.4 小结

基督教自唐代传入陕西以来,经历了1300多年的历史变迁。从唐贞观年间景教的初次传入、兴盛到逐渐衰微;天主教在元代的初次传入和在明清时期的正式传入;以及基督教新教在近代以来的大规模传入。尤其是明清以来天主教在陕西的传播以及近代以来基督教新教的大规模传播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中西文化的接触、碰撞、认同、融合、和会同的交流史,其中既留下了文化冲突的创伤与遗憾,也带来了不少文化交流的善果与收获。

^[13] 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志》,中国地方志丛书,235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8

3. 陕西教堂建筑的历史变化过程

3.1 唐代至元代的基督教堂

景教是东罗马基督教聂斯脱利派，五世纪末流行于波斯。唐贞观九年（635年），波斯景教僧侣阿罗本来到长安，唐太宗派宰相房玄龄到郊外迎接，并准其在长安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高宗以后又在各州建寺。当时的景教寺称波斯寺，玄宗天宝四年（745年）才改称大秦寺。这是长安最早的基督教寺院。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又在五郡城建造大秦寺。五郡城即五峰邱木山，位于今周至县城东南15公里的秦岭北麓，楼观说经台西面的大秦寺塔即大秦寺遗址^[1]。主教景静是波斯人，到长安后曾参与佛经的翻译，寺内砖塔也是仿造佛塔的形制建造的。塔高32米，七层八棱锥形，底层直径10米。（图3-1，大秦寺塔）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禁佛时，大秦寺、僧也同遭厄运，只余砖塔。



图 3-1, 大秦寺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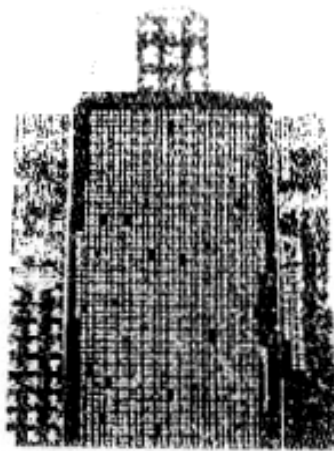


图 3-2,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立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于明熹宗天启五年（1625年）在陕西出土。（图3-2，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额上端刻有“十”字标志，由当时的大秦寺主教景静撰文。内容除记述景教教旨、教义和古罗马风土民

^[1] 出自向达，《唐代长安于西域与文明》

情外,还记载了景教在中国的传播情况以及景教僧侣在唐王朝 150 年间的政治活动等。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

“太宗文皇帝,光华启运,明圣临人。大秦国有上德曰阿罗本,占青云而载真经,望风律以驰艰险,贞观九祀,至于长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龄总仗西郊,宾迎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深知正真,特令传授。”

在天宝四年(745 年)以前,波斯被认为是聂斯脱利教派的根据地,因而其寺院在中国均被称为“波斯寺”,其僧侣测被称为“波斯僧”。阿罗本既至长安,不久便得到唐太宗信任。太宗特敕建寺,并准许度僧。《唐会要》卷四九《大秦寺条》云:

“贞观十二年(638 年)七月昭曰: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集群生。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教,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词无繁说,理有忘筌。济物立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廿一人。”

该寺在义宁坊十字街东北,当时称波斯胡寺。建成之后,太宗“旋令有司,将帝写真,转模寺壁。天资泛彩,英朗景门,圣迹腾祥,永辉法界。”^[2]唐高宗时,在诸州建景寺,并封阿罗本为镇教大法王,一时“法统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玄宗、肃宗也很支持景教。玄宗曾亲自为景教题额。天宝四年,玄宗下令把波斯寺改名为大秦寺。《唐会要》卷四九记载说:“天宝四载九月诏曰:波斯景教出自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国。爰初建寺,因以为名。将欲示人,必修其本。其两京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府郡置者,亦准此。”

长安义宁坊之外,尚有醴泉坊的景教寺。据宋敏求《长安志》说是波斯王卑路斯在 677 年要求建立的,景龙中(707—709 年)宗楚客将此寺圈入宅地,于是将景教寺改移至布政坊西南,祆寺之西。

唐武宗会昌五年(845 年)认为佛教的盛行“蠹耗国风”,“坏法害人”,下诏“灭佛”时,亦“勒大秦、穆护、祆三千余人,并令还俗,不杂中华之风”。中国内地的景教亦被禁止,从而衰微,到元代再次传入。^[3]

元世祖入主中华,基督教再次传入中国。蒙古人呼基督教为 Arcoun 名之为也里可温,在《元史·职官列传》中也记载了其时基督教已遍及全国的情况:北方如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直隶等省,南方如广东、云南、江浙等省,皆有也里可温教信徒居住,并建有供礼拜之用的教堂(十字寺)。

^[2] 引自《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3] 阜新平:《基督教犹太教志》(《中华文化通志·第九典·宗教与民俗》),上海人民出版社,51 页,1998.10

元代皇帝对也里可温信徒十分优待，常免除租税徭役。朝廷还设置崇福司，专门管理也里可温十字寺祭享等事。元朝蒙古贵族多信奉景教，其中皇太后唆鲁火帖就是著名的景教皇后。忽必烈封三王子忙哥刺为安西王，建立安西宫城（今西安城东北，浐河西岸高坡有遗址俗称达王殿），其中建立华丽景教寺。从此景教流行于安西路。安西路后改为陕西行省治所，又改为奉元路。

忽必烈执政期间，景教在甘州、宁夏、天德、西安、大度等处都设有主教区，其主教驻地“掌教司”数目达 72 所之多，反映了元代景教曾有过的繁华景象。在陕西，刊有“也里可温”之名的元代碑石，如户县祖庵镇重阳宫、凤翔县长寿观等共计 14 处之多，足证“也里可温”教曾在陕西广泛存在，确是无可置疑的事实。

3.2 明清以来的天主教堂

天主教早在 17 世纪初叶已从沿海传播到陕西。1620 年，罗马天主教会耶稣会教士艾儒略、德国天主教士汤若望先后来到西安游访考察。1625 年，比利时天主教神甫金尼阁和葡萄牙天主教神甫鲁德昭等进入西安传教，并在北城门里糖坊街修建了一座天主教堂。1644 年（明崇祯十七年），陕西的西安、汉中等地就有外国传教士建立的天主教堂。1669 年，清王朝与罗马教皇决裂，曾下令禁传天主教。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 年），陕西天主教主教区成立，总堂先设在泾阳县鲁桥镇，后移至西安土地庙什字。到 1844 年教禁松弛后，冯尚仁在高陵通远坊建立天主教堂，后又有意大利人林奇爱在西安城内土地庙什字修筑天主教堂，并从欧洲邀请来一批修女，在妇女中进行传教活动。

据 1922 年出版的《中华归主》一书记载，1644 年陕西西安府有教堂十所，教徒 2 万多人，汉中府有教堂 21 所（城内一所，城外五所，乡村会口十五所），教徒 4 万多人。

1581 年至 1840 年，天主教来陕西传教的修会，主要有耶稣会和方济各会。鸦片战争以后，天主教会在中国也争夺势力范围，划分传教区，兴建教堂。1885 年来陕传教的为圣伯多禄圣保罗会。1926 年来陕传教的为方济各特规会。陕西关中地区属英、法天主教传教区，汉中、兴安（今安康）属意大利传教区，陕北各地属比利时传教区。清光绪十三年（1887 年），陕南天主教由陕西主教区划出，成立汉中教区。到 1900 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外国教会在陕西关中高陵县通远坊、陕南城固县古路坝和陕北靖边县宁条梁分别建立了三个总教堂，传教士和信徒的人数也日益增加。1911 年成立延安教区，1928 年成立安康教区。30 年代先后成立了西安、三原、周至、凤翔、大荔五个教区。至 1949 年底，陕西共有天主教区 8 个，信教

群众 11.6 万多人，神职人员 500 余人，教堂 372 座。^[4]

天主教各教派在西安的教堂建设活动

时间	地点	创办者	名称	备注
始建于 1627 年 (明天启七年)	糖坊街	耶稣会	北堂	
1716~1727 年	土地庙什字	意大利方济各会	南堂	1765~1785 年在原基础上进行扩建，1884 年又做进一步扩建

3.3 近代以来的新教礼拜堂

截至 1949 年底，陕西基督教新教大小教派团体以及外国传教组织已达 20 多个，全省共有基督教堂 351 座，信教群众约 4 万人，分布在 70 多个县（市）。

其中外国差会设立的教会有：英国浸礼会、美国协同会、美国基督复临安息日会陕西区会、西安圣公会、西安基督教信义会、西安市基督教循理会、西安市基督教浸信会、美国以马内利与传道会等。全国性的组织有：西安基督徒聚会处、西安真耶稣教会、西安耶稣家庭等。西安市基督徒设立的教会有：西安市中华基督徒设立的教诲、西安市青年路基督教会、曹家巷教会等。^[5]

• 英国浸礼会

1885 年（清光绪十一年），基督教新教由英国浸礼会牧师莫安仁、敦崇礼及邵涤源传入，他们也是第一批进入西安市传教新教的外国传教士。他们在西安城东关长乐坊东新巷内设立差会，建立了西安市第一座基督教新教礼拜堂（耶稣教堂）。英浸礼会是在陕西传播历史较长、影响较深的一个教派。

^[4] 出自陕西省天主教爱国会内部资料

^[5] 李因信：《西安市基督教会历史简编》，西安市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1988.7

英浸礼会在西安的教堂建设活动

时间	地点	创办者	名称	备注
1903年 (清光绪二十九年)	东关长乐坊 东新巷	英浸礼会	耶稣教堂	
1919年 (民国八年)	南新街 (集贤巷)	英浸礼会	南新街礼拜堂	

• 美国协同会

美国协同会由英美及北欧各国内地会教士联合组成，原名为“斯堪的纳维亚布道会”，总会设于瑞典国，后移驻美国北部。1892年设立西安教会，在西关正街修建教堂，在西门里骆驼巷口设差会总机构，并办神学。随后，有更多传教士从北美到西安，分赴陕西省西北部各县，直达甘肃省的泾川、平凉等地。其传教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远，并不比英国浸礼会逊色，也是一个较大的西差会和教派。

美国协同会在西安的教堂建设活动

时间	地点	创办者	名称	备注
1903年(清 光绪二十 九年) ~1913年 (民国二 年)	西关正街	美教士诺淑仁、美教士 安视仁(建筑师)	西关正街大礼 拜堂	
	糖坊街	美国协同会	西安城内北大 街分会	
	柴家十字	美国协同会	礼拜堂	
	南关围墙巷	美国协同会	礼拜堂	

• 安息日会

西安市安息日会约在1919年先后，由美国传教士怀特创办。

安息日会在西安的教堂建造活动

时间	地点	创办者	名称	备注
1930年 (民国19年)	东大街柳巷口	安息日会	礼拜堂	

• 西安圣公会

西安圣公会的创始人是浦化人会长和董健吾会长。英国圣公会上海总议会传道部1916年派葛丕六、浦化人两会长来西安，成立“陕西中华圣公会传道区”，在西安城内北大街临西华门购地皮院落达四十余亩，建造“景风堂”及会所房屋，并发展西安郊区各分堂。

圣公会在西安的教堂建造活动

时间	地点	创办者	名称	备注
1945年 (民国三十四年)	北大街	圣公会	景风堂	景风堂于1958年教会合并时，改称为“西安教会北大街礼拜堂”

• 西安基督教信义会。

在1934年抗日战争时期建堂，正式成立。

基督教信义会在西安的教堂建设活动

时间	地点	创办者	名称	备注
1945年 (民国三十四年)	大差市西三道巷 甲字一号	信义会	礼拜堂	

• 西安循理会（1941年春成立）

循理会在西安的教堂的建设活动

时间	地点	创办者	名称	备注
1941年 (民国三十年)	西安城尚德路北头 四浩庄一号	循理会	礼拜堂	
1951年	西七路191号 (旧门牌)	循理会	礼拜堂	

• 西安浸信会（1942年成立）

浸信会在西安的教堂建设活动

时间	地点	创办者	名称	备注
1942年 (民国三十一年)	北关	浸信会	礼拜堂	

• 西安美国以马内利会（1944年成立）

美国以马内利会在西安的教堂建设活动

时间	地点	创办者	名称	备注
1947年 (民国三十六年)	南关围墙巷	美国以马内利会	礼拜堂及祷告 楼一座	

• 西安基督教徒聚会处（1944年成立）

基督教徒聚会处在西安的教堂建设活动

时间	地点	创办者	名称	备注
1944年 (民国三十三年)	尚德路七十七号	基督教徒聚会处	受浸池	

• 西安真耶稣教会 (1940年成立)

真耶稣教会在西安的教堂建设活动

时间	地点	创办者	名称	备注
1943年 (民国三十二年)	北关	真耶稣教会	礼拜堂	

• 西安市基督教自立会 (1913年成立)

基督教自立会在西安的教堂建设活动

时间	地点	创办者	名称	备注
1918年 (民国七年)	新西街	基督教自立会	新西街 大礼拜堂	1921年 进行扩 建

• 基督教礼拜堂 (曹家巷教会)

基督教礼拜堂 (曹家巷教会) 1928~1958年在西安的教堂建设活动

时间	地点	创办者	名称	备注
1928年 (民国十七年)	曹家巷	李海峰	基督教 礼拜堂	

• 生产路基督教会（又称拉撒路教会）

生产路基督教会（又称拉撒路教会）1942~1958年在西安的教堂建设活动

时间	地点	创办者	名称	备注
1941年 (民国三十一年)	北关自强东路 大成巷内	生产路基督教会	拉撒路教会礼 拜堂	

• 伯大尼院教会

伯大尼院教会 1942~1958年在西安的教堂建设活动

时间	地点	创办者	名称	备注
1944年 (民国三十三年)	南关冉家村	伯大尼院教会	伯大尼院教会 小型礼拜堂	

这些大小教派团体根据各自的传教势力范围以及财力的不同，在陕西或多或少的都建造了一些新教礼拜堂（图 3-3，西安市基督教会分布图）。^[6]

^[6] 图 3-3, 西安市基督教会分布图注 (1885—1958 年)

- (1) 西安市基督教会——原英浸会西安堂会旧址（南新街）现为：西安市基督教会与西安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地址（集贤巷）
- (2) 英国浸礼会——中华基督教陕西大会（包括差会、教堂、学校等）东关东新巷
- (3) 美国协同会——中华基督教协同会陕甘委员会（西关正街）
- (4) 美国协同会差会机关（西大街骆驼巷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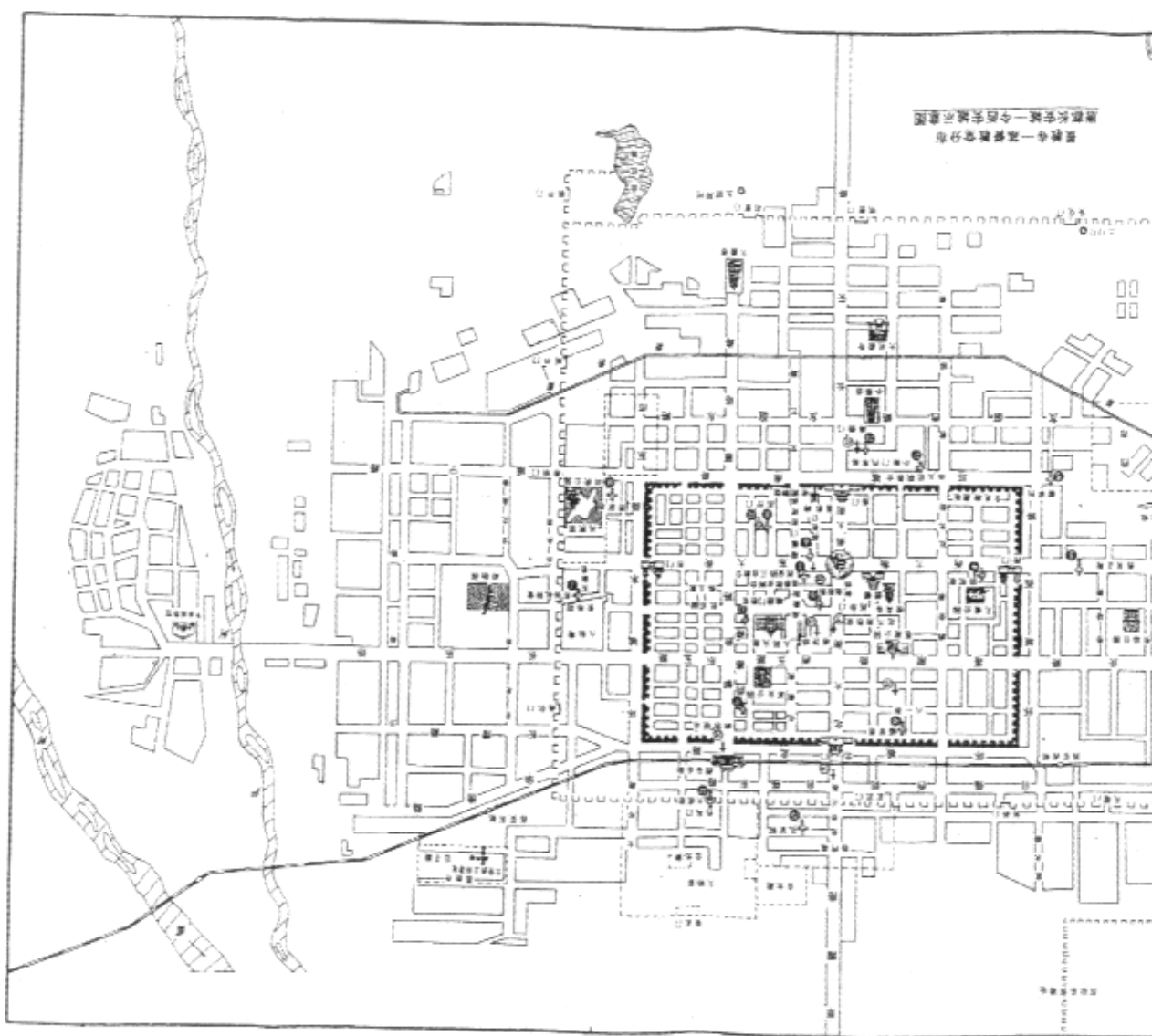


图 3-3, 西安市基督教会分布图

3.4 小结

早在唐贞观年间，在当时的长安就已经出现了第一座景教寺。随着景教在当时的长安的兴盛，景教寺也遍及陕西境内。随后由于景教在中原的衰微，景教寺也逐渐在陕西绝迹。直到元代“也里可温教”的兴盛，当时的教堂“十字寺”也曾在陕西广泛存在。虽然如今已无法看到当时的教堂建筑实例，但是通过对历史文献与建筑遗址的考证，还是可以对当时的教堂建筑情况有大致地了解。

明清以来随着天主教在陕西的广泛传播，特别是近代以来基督教新教的大规模进入，在陕西建造了大量的教堂建筑，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事实依据。

-
- (5) 美国基督复临安息日会陕西区会（西关解家村）
 - (6) 西安市基督复临安息日（东大街柳巷口）
 - (7) 中华圣公会陕西传道区——西安市圣公会景风堂（北大街西华门）
 - (8) 西安市基督教信义会（东厅门）
 - (9) 西安市基督教循礼会（西七路东段）
 - (10) 西安市基督教浸信会（北关正街）
 - (11) 美国以马内利会（南关围墙巷）
 - (12) 美国传道会（东厅门）
 - (13) 西安基督教徒聚会处（尚德路）
 - (14) 西安市耶稣家庭（福音里）
 - (15) 西安真耶稣教会（北关孔家院）
 - (16) 西安市中华基督教自立会（西新街）
 - (17) 西安市青年路基督教会（北门里）
 - (18) 曹家巷教会（东关南大街）
 - (19) 解放路教会（旧中正门里，尚仁路北头）
 - (20) 生产路教会（北关自强东路）
 - (21) 伯大尼院教会（南关冉家村）
 - (22) 西安市基督教青年会（东大街案板巷）
 - (23) 西安市基督教女青年会（新西街一通济坊）
 - (24) 协同会南关教堂—教案发生地

4. 陕西教堂建筑实例研究

基督教在唐朝和元朝曾两度传入陕西，但是没有遗留下来的教堂建筑实例。只有根据史书上的部分记载对其有大略的了解，但其具体建筑形式也已不可考。如今我们可以看到的教堂建筑实例，都是明朝中叶天主教以及近代以来基督教新教传入陕西以后建造的。因此，本章研究的教堂实例都是明清以及近代以来的陕西基督教教堂建筑。

4.1 陕西现存教堂建筑概况

4.1.1 天主教堂

1625年，比利时天主教神甫金尼阁和葡萄牙天主教神甫鲁德昭等进入西安传教，并在北城门里糖坊街修建了西安第一座天主教堂。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陕西的西安、汉中等地就有外国传教士建立的天主教堂。据记载，1644年陕西西安府有教堂十所，教徒2万多人，汉中府有教堂21所（城内一所，城外五所，乡村会口十五所），教徒4万多人。^[1]

到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外国教会在陕西关中高陵县通远坊、陕南城固县古路坝和陕北靖边县宁条梁分别建立了三个总教堂，传教士和信徒的人数也日益增加。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陕南天主教由陕西主教区划出，成立汉中教区。1911年成立延安教区，1928年成立安康教区。30年代先后成立了西安、三原、周至、凤翔、大荔五个教区。1949年底，陕西共有天主教区8个，信教群众11.6万多人，神职人员500余人，教堂372座。文革期间，多处天主教堂建筑被拆毁或被占用。文革结束后在政府的帮助下，大部分又陆续整修或重建恢复为宗教活动场所。截至1992年，全省共有天主教徒20万人，神职人员300多人，开放宗教活动场所250多处。^[2]

• 西安市糖坊街天主教堂

^[1] 李伯毅：《陕西省天主教历史述略》，西安政协，39页，No. 207, Vol. 38, 2002. 1

^[2] 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志》，中国地方志丛书，232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 8

简称“北堂”，于1625—1626年由王徵资助建造。初时为一座小教堂，称“天主圣母堂”，后进行重建，取名“崇一堂”。1630年后进行大规模扩建，并立碑记载，改名为“伯多禄堂”，占地面积四亩多，临街有门楼一座，正堂古典儒雅，风格别致。1966年以后北堂曾被占用，建筑物遭到严重破坏。1983年归还给教会，现为陕西天主教神哲学院所在地。

• 西安市五星街天主教堂

1716—1721年间，由陕西天主教第二任主教兰溪（意大利人）派传教士主持西安教务时修建，作为陕西天主教总堂。后由陕西天主教第三任主教方启升（意大利人）主持修建。清朝雍正年间全国禁教，该教堂关闭，教产充公。鸦片战争后，陕西天主教意大利籍主教高一志、林奇爱，凭借1860年中法签订的不平等《北京条约》，要回教堂，再次进行扩建。扩建后的南堂建筑面积为700平方米，系罗马式风格。堂面高17米多，分上、下两部分，上下相对称各有八根半圆青石柱。堂面顶部为三殿圆弧形，中间最高，上面装有十字架。1906—1908年间，德国人胡定邦任陕西主教后，又对南堂进行修葺。解放以后，南堂一直作为宗教活动场所开放。“文化革命”期间被其他单位占用，建筑物受到很大的破坏。近几年来，国家有关部门和西安市政府，拨专款对南堂进行了全面的维修。南堂现为西安天主教区主座教堂，也是陕西省和西安市天主教爱国会办公地址。

• 高陵县通远坊天主教堂

曾是西北地区天主教的发源地和活动中心，在国内外有一定的影响。1844年由意大利传教士主持修建。1857年扩建为大教堂。建筑物为砖木结构，可容纳2000余人。是当时西北地区唯一的一座规模较大的天主教堂。1966年以后，教堂堂面被拆，其他建筑也遭到破坏。1983年后，经维修重新恢复宗教活动。

• 户县围棋寨天主教堂

在户县甘河乡围棋寨村。建于1888年，为九间砖木结构，取名为中国主保大圣若瑟堂。1928年扩建为12间，并新修了30米高的堂面，整个建筑雕刻工艺精美。1966年教堂被拆，1988年重新建造。现教堂长47米，宽18米，建筑面积近千平方米，属中西式结合的建筑风格（图4-1，周至教区户县围棋寨天主教堂）。围棋寨村是中国天主教著名爱国人士、原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陕西省天主教爱国会主席、周至教区主教李伯渔的家乡。李伯渔主教1980年去世后，就埋葬在围棋寨天主教堂内。

• 周至县城天主教堂

建于 1899 年，为哥特式建筑风格。砖木结构，取名为“三位一体天主堂”。教堂高 30 米，宽 15 米，堂面正中最高处有不锈钢大十字架，两侧顶部各安装一个铁旗作为陪衬，有附属房屋 100 余间。教堂西南塔峰上悬挂铜钟一口，钟声音质嘹亮，可传五里。1932 年周至教区成立后，这里成为周至教区主教府。1966 年以后建筑物大部分被拆除，近年来又重新恢复为宗教活动场所。

• 城固县古路坝天主教堂

在城固县南约 30 公里处。原为汉中教区的主教府，是汉中教区建立后修建的第一座大教堂。建于 1904—1906 年，教堂面积 1000 多平方米，为罗马式建筑风格，占地 100 余亩。附属房屋 400 多间，教堂下面有预制的墓坑，先后埋葬有 30 多名中外主教、神甫。1966—1976 年间，教堂及大部分房屋被拆除，仅剩下房屋 40 多间。现已重新恢复为宗教活动的场所。



图 4-1，周至教区户县围棋寨天主教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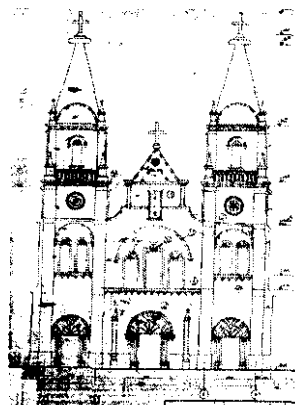


图 4-2，延安市桥儿沟天主教堂立面

• 延安市桥儿沟天主教堂

陕北著名天主教府。1911 年延安天主教区成立后，出资购买了美国人开办的“延长石油公司”的全部建筑物，开始筹建天主教堂。1934 年完工。罗马式风格，可容纳近千人。1936—1948 年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领导中国人民革命时，桥儿沟教堂曾被作为会议场所。1949 年 10 月后，被作为革命纪念地予以保护，供游人参观（图 3-2，延安市桥儿沟天主教堂立面）。

• 汉中市天主教堂

是汉中天主教区从城固古路坝教堂迁移到汉中后修建的主教座堂。1910 年动工，1913 年建成。教堂为罗马式建筑风格，面积 1200 平方米，可容纳 1500 人。教堂旁边建有钟、鼓楼，附属房屋 400 余间，设有拉丁语学校、医院、育婴堂、修女院、明德小学。1949 年 10 月以后，学校、医院、育婴堂等由人民政府接管。1966—1976 年间，教堂被拆毁。1987 年在原址重新修建，仍为罗马式风格。堂面高 23 米，能容纳 700—800 人。为汉中天主教区的主教座堂，汉中地区天主教爱国会所在地。

• 三原县城天主教堂

在三原县城辕门巷。1932 年三原天主教区成立后，选定在此修造主教府。1934 年动工，1938 年建成。主教座堂高 33 米，长 45 米，宽 18 米多，

大型结构均采用拱形。教堂主厅分为两层，两旁各以八面圆拱和七根圆柱撑托，将大厅分为三部分。正厅高 15 米，后部祭台为一大圆穹建筑。1966 年以后教堂曾被工厂占用，1979 年不慎失火，将教堂烧毁。近年来又在原址重建了一座教堂，基本保持了原来面貌。（图 4-3，三原县城天主教堂）

• 凤翔县城西街天主教堂

是 1932 年凤翔天主教堂成立后的同年，在原址扩建而成的。1966 年以后，教堂及附属建筑曾被占用或拆除。后吸收信教群众部分捐助资金，1988 年由政府补助专款，重新修建。（图 4-4，凤翔县城西街天主教堂）



图 4-3，三原县城天主教堂



图 4-4，凤翔县城西街天主教堂

• 大荔县城天主教堂

原为大荔天主教区主教座堂，是 1932 年大荔天主教区成立后，首任意大利籍主教在原一座小教堂基础上扩建的。附设有修道院、医院、孤儿院、小学各一所。1949 年以后，教会所办医院、小学和孤儿院被人民政府接管。1966 年以后教堂曾被占用，现以退还给教会。

• 陕西地区其他天主教堂



图 4-5，渭南教区南白圣母无染原罪堂

图 4-6，榆林教区靖边县东坑乡硬地梁天主堂

4.1.2 基督教新教教堂

清光绪二年（1876 年），英国内地会传教士鲍康宁与金辅仁来陕传教。他们通过开办学堂、医院和慈善事业，传播基督教。光绪十一年（1885 年）英国浸礼会牧师莫安仁、敦崇礼及邵涤源在西安城东关长乐坊东新巷内设立差会，建立了西安第一座基督教新教教堂（耶稣堂）。此后，欧洲、北美各国基督教新教各教派和传教组织均派传教士相继而来。

截至 1949 年底，在陕外国传教组织已达 20 多个，全省共有基督教堂 351 座，信教群众约 4 万人，分布在 70 多个县（市）。文革期间，多处天主教堂建筑被拆毁或被占用。文革结束后在政府的帮助下，大部分又陆续整修或重建恢复为宗教活动场所。截至 1992 年，全省现有基督教教牧人员 170 多人，信教群众 14 万人，开放

宗教场所 400 多处。^[3]

• 汉中市基督教堂

位于汉中市城内友爱路。1879 年由英国基督教传教士修建。初建时有二层楼房一座、平房四间，以后修建了教堂和学校、医院等建筑。占地面积 9333 平方米。1949 年 10 月以后，经过基督教自治、自养、自传的革新活动，成为汉中市基督教各教派联合礼拜的场所。1966 年以后，教堂及其附属房屋被占用或拆除。现存有临时礼拜堂一所，可容纳 2000 多人。现为汉中地区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所在地。

• 西安市东新巷基督教堂

约于 1890 年由英国基督教传教士所建，是西安较早的基督教堂之一。初建时有九间平房，名“救世堂”，后因教徒增加，於 1909 年重建。新建教堂名“耶稣教堂”，为七间厅室建筑，堂内无明柱，全部房架支撑在边墙石柱之上。占地十余亩，原设有学校和医院。1949 年 10 月以后教堂曾是教徒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1966 年以后被工厂占用，现已归还教会。

• 三原县城基督教堂

在三原县城东关油坊道。建于 1915 年，后数次进行扩建，面积约 300 平方米，附属房间 100 多间。教堂即有哥特式建筑风格的高尖矗立，又有中国古建筑风格的飞檐和拱形线条。堂面有反映基督教教义的浮雕字画。南北两座对称钟楼，尖顶上装有十字架，整个建筑布局把中西式建筑风格融合得和谐而又有特色。这里是陕西基督教神学教育的重要基地，1949 年 10 月以前，曾开办过“妇女道学班”、“关中道学院”等，现为陕西基督教圣经学校所在地。

• 西安市南新街基督教堂

位于西安市集贤巷甲字一号。基督教英国浸礼会传入西安后，于 1919 年修建。为尖顶砖木结构建筑形式，有明柱、暗柱各 12 根支撑，宽阔大方，可容纳 500 多人。教堂前有钟楼对立于堂内，显得十分肃穆庄重。教堂占地约 15 亩，附设房屋几十间，旁边为教会开办的“崇德小学”。解放以后，学校由人民政府接管，教堂一直作为宗教活动的场所。“文化革命”期间，该教堂被占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3] 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志》，中国地方志丛书，235 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8

会以后，有关部门落实宗教政策，教堂归还给教会。南新街教堂现为陕西省和西安市基督教协会。

4.2 天主教堂实例研究

4.2.1 西安市五星街天主教堂

• 建筑沿革

西安市五星街天主教堂又称南堂，始建于清康熙五十四年<1716年>，是由意大利籍方济各会会士陕西天主教第二任主教兰溪于1716~1727年间派意大利籍传教士马戴弟主持西安教务时，在土地庙十字购地筑院建堂的，建成后即为天主教陕西省总堂。

1765-1785年间，由意大利籍方济各会会士陕西天主教第三任主教方启升在原基础上加以扩充和改建。清雍正年间全国教禁，南堂关闭。后由山西与陕西教区分开后的陕西第二任和第三任主教高一志、林奇爱从1862年起即与清政府陕西当局经多年交涉，终于1884年索回教产，并再次扩建。扩建后的南堂为十间大堂七百平方米，堂面高17.45米。大堂系仿古式砖木结构，内部采用拱形，体现出罗马式风格，使中西建筑融为一体。院内附属房屋158间，总面积20亩1分6厘。1906—1908年间，胡定邦出任陕西第五任主教，对南堂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整修。从20世纪起，这里曾先后创办玫瑰女子中小学，若瑟男子小学，安多医院和玛丽诊所。

文革期间教堂被占用，七十年代国家拨乱反正，落实宗教政策，将南堂于1980年归还教会，但因年久失修，大堂已破烂不堪。1990年又经国务院宗教局和西安市政府拨款维修，基本恢复了原貌。现为西安教区总堂主教府和省市天主教爱国会所在地。^[4]

^[4] 附：南堂碑文。

“天主教据传溯自汉代，时有圣多默宗德初入中国传播天主教。但真正把天主教基本教义传入中国的是景教教士阿罗本。唐贞观九年聂斯托利派主教阿罗本偕同道数人，抵长安。太宗李世民命宰相房玄龄，总仗西郊，宾迎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深知正真，特令传授。”并于贞观十二年七月下诏，允其建寺度僧传道。高宗时“法流十道，寺满百城。”从此景教流行于中国长达二百余年。唐武总会昌五年九月十三日（845年）下诏禁绝佛寺，祸及景教，自此销声匿迹。

明天启五年“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出土于西安崇仁寺。消息广传，中外震惊，遂引起世

• 建筑现状与特征

目前所存天主教堂单层三跨，十开间。由东侧起第一、四、六开间各向南北延伸一跨，成为六个凸出主体的小室（图 4-7，西安市五星街天主教堂正面外观）。



图 4-7 西安市五星街天主教堂正面外观图



图 4-8，西安市五星街天主教堂侧面外观

界各国名流、学者、教师的兴趣和关注，视如至宝，以亲目为快。前来观光的南怀仁、汤若望、方德望、鲁德昭等人。影响所及，对天主教的兴趣和发展，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冬去春来，人间沧桑。公教几经倾覆。清康熙五十五年（1717 年），因礼仪之争，再次下诏严禁天主教传播。雍正初年（1724 年）继承前朝政策，下诏禁教。从此圣教艰难，历雍、乾、嘉、道四年，先于禁教。但禁者自禁，传者自传，至清末，方渐更，并有所发展。

南堂始建于清康熙五十四年（1716 年）是由意大利籍方济各会会士陕西天主教第二任主教於 1716—1727 年间派意大利籍传教士马戴弟主持西安教务时，在土地庙什字购地筑院建堂的，建成后即为天主教陕西省总堂。1765—1785 年间，又由意大利籍方济各会会士陕西天主教第三任主教方启升在原基础上加以扩充和改建。清雍正年间全国教禁，南堂关闭，后由山陕教区分开后，陕西第二任和第三任主教高一志、林奇爱从 1862 年起即与清政府陕西当局经多年交涉，终于 1884 年索回教产，并再次扩建。扩建后的南堂为十间大堂七百平方米，堂面高 17.45 米。大堂系仿古式砖木结构，内部采用拱形，体现出罗马式风格，使中西建筑融为一体。院内附属房屋 158 间，总面积 20 亩 1 分 6 厘。1906—1908 年间，胡定邦出任陕西第五任主教，将南堂全部修葺一新。从 20 世纪起，这里曾先后创办玫瑰女子中小学，若瑟男子小学，安多医院和玛丽诊所。数十年来，南堂不仅在荣主益人、爱国爱教和教会发展等工作上都取得了卓著的成绩，同时在社会公益和国家教育事业方面，也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十年浩劫期间南堂被占用，为教堂尚未拆毁幸存至今，七十年代国家拨乱反正，落实宗教政策，南堂于 1980 年归还教会，现为西安教区总堂和总教府所在地，因此在国内外享有盛誉。但因年久失修，大堂已破烂不堪。1990 年国务院和西安市政府拨款维修，在人民政府的关怀支持下，在省古建公司的能工巧匠的精心雕琢下，遂于 1991 年 10 月修复原样顺利竣工”。

此堂内部装饰华丽，左右侧廊与中厅之间为连续的券柱式拱廊。柱式为科林斯式。廊与屋顶相交处有数层涂有彩画的线角加以装饰，可谓中西合璧。圣坛位于西端。东端为主入口。东立面为中华巴洛克式，三开间、二层，双柱叠柱式，顶部以巴洛克曲线做为结束。线角丰富，花饰精美，其中很多细部花纹揉入了中国传统建筑的细部纹饰。东立面二侧凸出的二个小屋为中国传统建筑风格，墙面砖雕十分精美。正因为东立面上的细部花纹具有中式风格，因此东立面和两侧小屋虽风格迥异但二者放在一起并不显得太不协调。其余四个凸出的小屋也均为中国传统建筑形式。主入口饰有字匾楹联。

这幢建筑的总体布局，内部划分为比较典型的欧洲宗教建筑形式，东立面为中华巴洛克式，贯穿于整个建筑内外的细部装饰更多的渗透出中式风格（图 4-8，西安市五星街天主教堂侧面外观）。

4.2.2 高陵县通远坊天主教堂

• 建筑沿革

曾是西北地区天主教的发源地和活动中心，在国内外有一定的影响。道光二十四年（1844 年）中美望厦条约签订后，冯尚仁为陕西区主教兼督甘肃教务，他选购高陵县通远坊土地为建立总堂基地。1844 年由意大利传教士主持修建。1857 年扩建为大教堂。1966 年，教堂的堂面被拆，其它附属建筑也遭到破坏。1983 年，教堂经维修后重新恢复宗教活动。教堂内部和结构基本保持了始建时的原貌。

• 建筑现状与特征

建筑物为砖木结构，由两列木柱与砖墙共同承重，可容纳 2000 余人。是当时西北教区的一座规模较大的天主教堂。教堂平面为长方形，堂面宽约 14 米，长约 52 米。教堂内部是长方形的空间，由纵向的两列木柱分为三个部分，中间较高，两边的侧廊较低。（图 4-9，高陵县通远坊天主教堂内景）

两侧的墙体上有埋葬于此的中外牧师与传教士的墓碑。祭坛与旁边小屋与大厅的连接部分采用拱形，门窗也采用圆拱形。青砖外墙，中式瓦屋面。立面基本保持了建造时的原貌，双柱、中国式的匾额加上巴洛克曲线，具有典型的中国式的巴洛克风格。（图 4-10，高陵县通远坊天主教堂平面），（图 4-11，高陵县通远坊天主教堂正面外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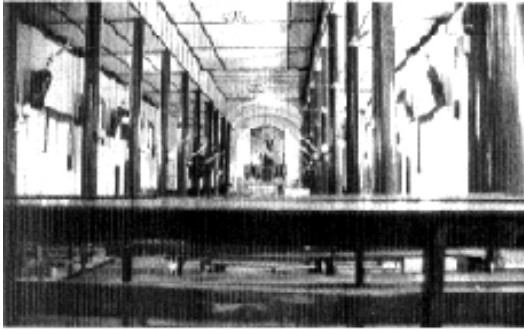


图 4-9, 高陵县通远坊天主教堂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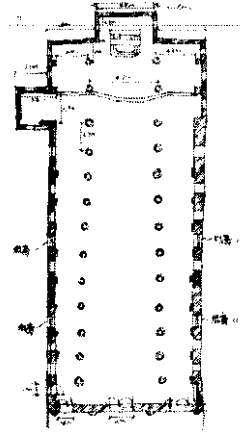


图 4-10, 高陵县通远坊天主教堂平面

4.2.3 小结

这两座天主教堂都是意大利耶稣会教士主持修建的。耶稣会的教堂（图 4-12，耶稣会教堂）一般以罗马维尼奥拉（G·B·Vignola, 1507—1573 年）设计的一座巴洛克教堂为蓝本，17 世纪正值意大利巴洛克建筑鼎盛期，由此可知明清时期的天主教堂中，应当有相当一部分呈现出巴洛克风格。明清时期陕西的天主教堂也不例外，不过也具有有一些不同与西方巴洛克的特征。



图 4-11, 高陵县通远坊天主教堂正面外观



图 4-12, 耶稣会教堂

1、揉入中国传统建筑细部。巴洛克繁缛的雕饰，与中国传统建筑丰富的细部纹饰，有一些异曲同工之处。这使得中国工匠在建造过程当中，自觉不自觉的在巴洛克中揉入自己驾轻就熟的传统建筑细部。常见的有字匾、雀替、望柱、卷草、

三福云、垂莲、云纹、万字纹、寿字纹等等。在这两座教堂中都可以看到巴洛克门面中渗入了中式的匾额，有的还在柱头中渗入了中式的卷草纹饰。

2、运用传统的材料与工艺。在外国传教士的指导下，中国工匠运用自己所熟悉的传统的材料和工艺来建造教堂，因此呈现出一种特殊的风格。如一些清水砖的做法以及琉璃瓦的运用。

3、用字匾、楹联表意。中国传统建筑一般利用字匾、楹联表意，这和善于用形态和雕刻表达一定意义的西方古典建筑不相同。在耶稣会传教士建造巴洛克式教堂时，便因袭了中国传统建筑的这一做法，巴洛克的立面便揉入了匾额、楹联。

4、表面的巴洛克式风格。由于传教士毕竟不是专业的建筑师，也没有专业的设计图纸，往往是凭自己的记忆来主持建造教堂。因此主要是在教堂的立面与主要空间因袭了巴洛克风格，其他的部分大都是由中国工匠以自己的经验来建造。在这两座教堂中都可以看到，屋顶、甚至有的侧立面等地方几乎完全是中国传统建筑的做法。

4.3 基督教新教礼拜堂

4.3.1 三原县城基督教堂

• 建筑沿革

英国浸礼会牧师莫安仁、敦崇礼、邵涤源（A·G·Shorroek）等于1885—1887年，先后从太原市入陕，在三原县东关油坊道购买地皮，修建礼拜堂。三原县城基督教堂建于1915年，为英国传教士武德逊设计并主持建造（图4-13，三原县城基督教堂原貌），（图4-14，三原县城基督教堂现状外观）。



图 4-13，三原县城基督教堂原貌图



图 4-14，三原县城基督教堂现状外观

• 建筑现状与特征

教堂为砖木结构，双层砖墙承重，人字形木屋架。长方形平面，长约 23 米，宽约 12 米，面积约 300 平方米（图 4-15，三原县城基督教堂平面）。教堂为英浸礼会创建，所以讲坛前方设有长 3.4 米、宽 1.4 米的洗礼池（图 4-16，三原县城基督教堂内景）。教堂既有哥特式建筑风格的立面构图特色，又有中国古建筑风格的飞檐与线条。立面模仿典型的哥特教堂建筑格局山面向前，面阔三间，两侧为对称的高耸钟楼，入口设在两个钟楼下方。钟楼的立面构图和细部装饰为中国传统建筑风格。楼顶飞檐戛角，楼身用青砖砌成或雕成各色中国传统花纹，图案丰富精美整个建筑布局把中西式建筑风格融合得和谐而又有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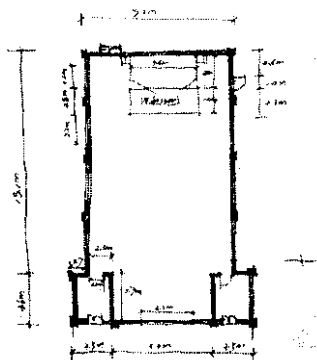


图 4-15，三原县城基督教堂平面



图 4-16，三原县城基督教堂内景

4.3.2 西安市东新巷礼拜堂

• 建筑沿革

东新巷礼拜堂建于 1890 年，为英国传教士武德逊主持建造。英国浸礼会牧师莫安仁、敦崇礼、邵涤源等于 1885—1887 年，先后从太原市入陕，先经三原县后又来到西安市东关建造救世堂传教。

• 建筑现状与特征

该堂单层、单跨、五开间，双坡屋顶，平面为矩形。其西端为讲坛，东端凸出一个矩形小空间，做为进入礼拜堂的门斗，信徒可从南北两边进入门斗，然后再从东面进入礼拜堂（图 4-17，西安市东新巷礼拜堂正面外观）。



图 4-17, 西安市东新巷礼拜堂正面外观 图 4-18, 西安市东新巷礼拜堂屋架与柱头节点

礼拜堂屋顶结构为人字形木屋架支撑檩、椽和小青瓦屋面，屋架低部有半圆弧木构架将两侧的斜木撑和中间的人字形木屋架相联，最终落脚于两侧的石柱头上，整个屋架结构受力合理，造型简洁明快（图 4-18，西安市东新巷礼拜堂屋架与柱头节点）。其弧形的木构架与南北侧墙上圆弧长窗，以及东墙上圆弧形入口及龕相呼应，形成浓郁的欧洲古典宗教建筑的情调。

该礼拜堂外墙采用青砖清水砖墙。东立面轮廓大致为三角形，最顶部山头呈半圆形，其上高耸十字架，山墙呈阶梯形一层层的下降，（有点象中国传统民居中的马头墙，只不过脊头被几何化了）天空线很富于变化。礼拜堂东立面之前，还有较矮的门斗山墙，其轮廓也大致为三角形，山头为半圆形，轮廓线很活泼，和礼拜堂的东立面相呼应，礼拜堂东立面中央为划分成三部分的半圆形大玻璃窗，两侧各有一个嵌在高直龕中的方窗。整个东立面左右对称，山墙的轮廓线，窗户的排布，龕及十字架的摆置都强烈的突出了中轴线，显得层次分明，错落有致，简洁明了。礼拜堂南北立面砖垛外露，开圆弧形高窗，西墙不仅为礼拜堂的外墙也是整个教堂区域与隔壁民宅的院墙。

门斗的入口为中国传统建筑形式——硬山的做法，砖叠涩挑檐，青瓦坡顶，椽头外露。在这里，中国传统建筑形式与用砖表现出的有节制的巴洛克造型配合得十分融洽。

4.3.3 西安市南新街礼拜堂

• 建筑沿革

南新街礼拜堂，又称集贤巷（即吉贤巷）礼拜堂，建于1919年。是由中国牧师张子宜及西安基督教著名人士岳文卿、董耀东、孙风堂、梁玉甫等筹建。在英浸礼会牧师邵伯清、武德逊的协助下，建造南新街礼拜堂及其附属房屋二十多间，占地约十亩。英浸礼会设立为“西安堂会”。今为陕西省三自基督教协会与西安市三自爱国会机关住址。

• 建筑现状与特征

砖木结构，由明柱暗柱各12根支撑。平面为矩形，单层、三跨、五开间，东面凸出两座塔楼，均设有入口（图4-19，西安市南新街礼拜堂入口）。礼拜堂西端为讲坛，内部布置很简单，圆柱与水平吊顶及水泥地面直接相接，没有柱头，柱础。圆弧长窗仅做简单方格分割，室内几乎没有雕饰。



图 4-19，西安市南新街礼拜堂入口



图 4-20，西安市南新街礼拜堂钟楼

礼拜堂外墙为清水砖墙，南北立面由外露砖垛划分为五开间，除最东端一间为塔楼外，其余各间外墙上均设有两个圆拱窗。此堂东立面最有特色，它模仿典型的教堂建筑格局山面向前，面阔三间，两侧为高耸钟楼，但是钟楼的立面构图和细部装饰为中国传统建筑风格。楼顶飞檐戛角，楼身用青砖砌成或雕成各色中国传统花纹，图案丰富精美（图4-20，西安市南新街礼拜堂钟楼）。双楼所夹山墙高于屋面，顶部轮廓为三角形，这不仅与双坡屋面在结构形式上是相对应的，而且它和两侧高

高翘起的楼顶一起构成了向上的动势。山墙顶部有青砖砌的中式线脚，中部发了三个卷，一个大卷内套了两个平等排列的小卷，为欧式建筑风格。

由于地形所限，该堂的主要入口位于南边钟楼的南墙上，北边钟楼朝东开一偏门。主入口上悬有匾额，两侧挂大红对联，这些中式装饰与西式的圆拱门相配的既醒目又协调。这座礼拜堂从整体布局来看为西式风格，但立面构图和细部装饰几乎全部是中国传统建筑风格，处理手法相当纯熟毫无生硬之感。

4.3.4 小结

新教是十六世纪基督教宗教改革的产物，对传统的宗教礼仪进行了简化与改革。因此，相应的，基督教新校对教堂的形制要求也没有天主教那么严格。其教堂形式也相对比较简单。近代以来在陕西建造的基督教新教礼拜堂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西式构图，中国元素；另一种则是较为简洁的现代建筑形式。例如三原县城基督教堂与西安市南新街礼拜堂，就属于较为典型的哥特式构图，一对钟塔夹者中厅的山墙，但是钟塔却运用了中国传统的建筑元素——钟楼。而近代形式简洁的新教礼拜堂则是陕西最早的现代风格建筑之一。

5. 陕西基督教堂建筑的特征

基督教在唐朝和元朝曾两度沿陆路由西亚传入中国，但对中国文化和宗教没有产生较大的影响，也没有遗留下来的教堂建筑实例。只有根据史书上的部分记载对其有大略的了解，但其具体建筑形式也已不可考。如今我们可以看到的教堂建筑实例，都是明朝中叶 16 世纪以沙勿略和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是进入东亚是基督教的第三次传入以后建造的。因此，本章主要论及的是明清以及近代时期的基督教堂建筑，通过陕西基督教堂与国内其他地区的基督教堂建筑在建筑形式与建筑技术方面的比较，总结出陕西基督教堂建筑所具有的一些特征。

5.1 陕西基督教堂建筑形式的特征

5.1.1 陕西基督教堂的主要建筑形式

明清至近代以来，陕西基督教堂的主要建筑形式大致可以分为中国式与中西合璧式两大类。

一、中国式的教堂

十七世纪初叶，天主教初传入陕西，当时的传教方式都尽量中国化，用以避免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冲突。天主教在中国采取了“合儒”的策略，传教士以儒士姿态出现，当时新建教堂或购买私宅改建的教堂大多为“中国式”。如 1625 年比利时天主教神甫金尼阁和葡萄牙天主教神甫鲁德昭等在西安市北城门里糖坊街修建的一座天主教堂，初建时称“天主圣母堂”，后又取名“崇一堂”，1630 年扩建后改名为“伯多禄堂”。这座天主教堂建筑采用了中国古典建筑形式，临街建有中式门楼一座，教堂的正堂也是中国式的，风格古典儒雅。

二、中西合璧式的教堂

经过初期的“合儒”的策略以后，再加之中国式的教堂难以适应基督教的一些礼仪、宗教象征等方面的需求，西方传教士开始建造一些西式教堂。尤其是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大批进入陕西，教堂大量出现。与以往避免同中国传统文化冲突的传教政策相反，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宗教的传入表现出胜利者的姿态，教堂大都明确采用正规西方教堂样式，教堂成为宗教精神的象征。然而这些西式教堂，不是经过正规建筑师设计。一般都是由外国传教士根据自己的记忆设计绘图

并主持建造，又为了适应就地取材和采用中国传统的建筑技术而由中国工匠加以修改。因此，这样的教堂建筑既不是正规的西式教堂，也有别于传统中国式的建筑。这样的中西合璧式的教堂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 巴洛克式与传统建筑的融合

明清时期陕西的天主教堂中出现了一些以西方的巴洛克式教堂为蓝本，由本地工匠建造的“巴洛克式”教堂。如由意大利人传教士主持修建的西安市五星街天主教堂和高陵县通远坊天主教堂。这两座天主教堂都是意大利耶稣会教士主持修建的，耶稣会的教堂一般以罗马维尼奥拉（G·B·Vignola,1507—1573年）设计的一座巴洛克教堂为蓝本。17世纪正值意大利巴洛克建筑鼎盛期，因此在这一时期的意大利耶稣会教士主持修建的天主教堂中，应当有相当一部分呈现出巴洛克风格。

这两座教堂也具有一些明显的巴洛克建筑特征，比如双柱、叠柱、断裂的山花、巴洛克曲线等元素的运用，营造出了具有凹凸起伏雕塑感的巴洛克式立面。在这座教堂的巴洛克式的立面中都融入了一些中国传统建筑元素，例如在巴洛克式的立面中融入了中式的匾额、楹联，有的还在西式的柱头中融入了中式的卷草纹饰等。

此外，建筑采用了传统的建筑材料与工艺，例如一些清水砖与屋顶的做法等等。这类教堂建筑呈现出巴洛克式与传统建筑融合的特点。

• 哥特式与传统建筑的融合

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武德逊主持建造的两座教堂：三原县城基督教堂和西安市南新街礼拜堂都属于这个类型。在这两座教堂中可以看到典型的哥特式构图特征：山面向前，面阔三间，一对钟塔加着中厅的山墙，垂直的分为三部分。虽然建筑采用了哥特式的建筑布局和立面构图，但是又有传统建筑的飞檐与线条，例如钟塔的塔顶檐口做法完全是传统建筑风格，飞檐戗角，在其中还运用了传统的砖雕花纹。这类教堂建筑呈现出哥特式与传统建筑的融合的特点。

• 其他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教堂具有罗马风与传统建筑的融合的特点，如城固县古路坝天主教堂和延安市桥儿沟天主教堂。还有一些教堂具有多种西方建筑风格与传统建筑融合的特点，如三原县城天主教堂（图 5-1，三原县城天主教堂），兼有罗马风和希腊式建筑风格，又融合了一些传统建筑元素。

另外，陕西地区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教堂建筑形式，例如宜川县英旺基督教堂（图 5-2，宜川县英旺基督教堂），是窑洞的形式，这也是由于环境条件所导致的一种较为特殊的教堂建筑形式。



图 5-1, 三原县城天主教堂



图 5-2, 宜川县英旺基督教堂

5.1.2 国内其他地区基督教堂建筑的主要建筑形式

据文献记载,最初的教堂建筑都是沿用民房改建或沿用中国旧式房屋。这是因为早期的传教方式都尽量中国化,又以避免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冲突。明清时期的天主教在中国采取了“合儒”的策略,传教士以儒士姿态出现,当时新建教堂或购买私宅改建的教堂大多为“中国式”,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少数正规西方样式教堂。在中国锁国时期,天主教虽被禁绝,但在中国仍潜伏延续下来,暗中活动的教堂多位于偏僻乡村,以传统民居略作改造,外观上没有变化,内部空间近似于三廊型巴西利卡。

鸦片战争开埠后,西方传教士大批进入中国,教堂大量出现。与以往避免同中国传统文化冲突的传教政策相反,开埠后西方宗教的传入表现出胜利者的姿态,无论是租界内为西方侨民服务或是面向中国人的教堂都明确采用正规西方教堂样式,教堂成为宗教精神的象征。后来一些西方传教士开始设计西式教堂,但初期建造的教堂基本上还是中国厅堂式建筑间杂一些西方风格,实际上多为“中西混合式”的西式教堂。

这些最早的西式教堂,极少经过正规建筑师设计。一般都是由外国传教士自己设计绘图,又为了适应就地取材和采用中国传统的建筑技术而由中国工匠加以修改。初期的西式教堂多为高直式和巴洛克风格,这显然是受当时欧洲建筑风格的影响。这种教堂的一般特点是:整体的造型比例与构造方式为西式建筑,而细部装修则往往夹杂中国传统建筑手法。此外,初期西式教堂还有罗马式、巴洛克式等。

在这些早期的非职业“建筑师”中,当然也不乏谙熟西方建筑艺术的人。特别是在那些传教士当中,为了在中国从事长期的传教事业,因而他们建筑的教堂也就更希望建造成欧洲的传统式样。

1、明清时期的天主教堂

天主教自明末万历年间（十六世纪末叶）传入中国后，天主教堂也逐渐出现了。清朝初年，清政府采取闭关自守政策，曾一度禁止西洋教士传教，教堂建筑也大部分遭到破坏，遗留到今天的很少是鸦片战争前的原物了。北京宣武门内天主教堂（俗称南堂）是清顺治十四年（1657）建造的，是遗留至今建造年代较早的一座教堂，而佘山天主教堂和上海旧城安仁里世春堂，都是在明末的旧址上重新建造的。^[1]

16至17、18世纪实施锁国政策之前，天主教是中国吸收西方文化的最主要途径。同时，天主教的传教方式都尽量中国化，又以避免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冲突。据文献记载，最初的天主教堂都是沿用中国旧式房屋，利用民房改造。天主教在中国采取了“合儒”的策略，传教士以儒士姿态出现，当时新建教堂或购买私宅改建的教堂大多为“中国式”，如北京南堂（1605）、上海敬一堂（1640，图 5-3，上海敬一堂）等。^[2]

后来一些西洋传教士开始设计建造西式教堂。初期的西式教堂多为高直式和巴洛克风格，这显然是受当时欧洲建筑风格的影响。这种教堂的一般特点是：整体的造型比例与构造方式为西式建筑，而细部装修则往往夹杂中国传统建筑手法。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少数正规西方样式教堂，以澳门大三巴教堂（1602，图 5-4，澳门大三巴教堂）为代表，由意大利传教士史比诺拉（Carlo Spinola）设计，呈巴洛克风格，是中国最早的正规西式建筑。



图 5-3，上海敬一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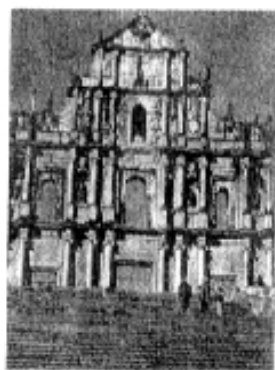


图 5-4，澳门大三巴教堂

鸦片战争开埠后，西方传教士大批进入中国，教堂大量出现。与以往避免同中

^[1] 王绍周：《中国近代建筑图录》，92页，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9

^[2] 参见徐卫国：《试论近代基督教之“中国式”建筑》，《建筑史研究论文集（1946-1996）》，205页，清华大学建筑学术丛书，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

国传统文化冲突的传教政策相反,开埠后西方宗教的传入表现出胜利者的姿态,无论是租界内为西方侨民服务或是面向中国人的教堂都明确采用正规西方教堂样式,教堂成为宗教精神的象征。中国近代主要开放城市,上海、北京、天津、汉口和南京等地,最早出现的正规西式建筑都是教堂。这些地区的早期教堂大多由具有艺术素养的西方传教士设计,少数由传教士按照从本土带来的设计图纸指导建造,如四川省彭县白鹭乡天主教堂(图 5-5,四川省彭县白鹭乡天主教堂),或者直接委托本土著名建筑师设计,如上海第二代圣三一教堂(图 5-6,上海第二代圣三一教堂)。^[3]



图 5-5, 四川省彭县白鹭乡天主教堂



图 5-6, 上海第二代圣三一教堂

2、近代的天主教堂与新教礼拜堂

中国近代教堂建筑是正统欧洲建筑文化传入中国的重要领域,尤其是在近代早期。在中国近代主要城市中,教堂往往是该城市或地区内最具艺术价值、最具有标志性的近代建筑。

最初的教堂建筑都是沿用民房改建或沿用中国旧式房屋。后来一些西方传教士开始设计西式教堂,但初期建造的教堂基本上还是中国厅堂式建筑间杂一些西方风格,实际上多为“中西混合式”的西式教堂。上海地区较早移植欧洲的建筑风格,其西式教堂一般造型比例与构造形式均为西式,但细部装饰夹杂中国传统建筑手法。^[4]此外,初期西式教堂还有罗马式、巴洛克式等。

鸦片战争后到“五四”运动的八十年间是西方教会建筑的主要活动时期,教堂遍布中国广大城市以至偏僻的乡镇。教堂建筑以其高耸的体量,成为十分触目的景象。一些较大型的教堂占地很大,造型多种多样,有罗马式的,如青岛天主教堂;

^[3] 沙永杰:《“西化”的历程——中日建筑近代过程比较研究》,81页,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11

^[4] 伍江:《上海百年建筑史(1840-1949)》,54页,同济大学出版社,1997.5

有哥特式的，如北京北堂；有文艺复兴式的，如北京八面槽救世军礼拜堂；中国宫殿式的，如北京中华圣公会教堂。东正教系统则多为俄罗斯式，如哈尔滨中央教堂、上海东正教总会等。教堂建筑构造、材料基本上不脱离砖木结构，也有新的结构内容，如外墙承重、木行架的运用以及大量拱券构造等等。早期教堂多为一、二层砖木结构。1900年以后，出现五层以上建筑，则常用砖、木、钢混合结构，教堂平面空间偏大，外廊较多。^[5]

19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中国主要城市内的教堂

城市	教堂	建造年代	设计者
上海	第一代圣三一堂	1847年	不详
	虹口美国教堂	1854年	不详(传教士?)
	早期徐家汇教堂	1851年	范廷佐修士
	董家渡教堂	1853年	范廷佐修士
	洋泾浜天主堂(若瑟堂)	1861年	罗礼思神父
	第二代圣三一堂	1869年	G司各特+凯德纳
	西堂	1867年重建	不详
天津	望海楼天主堂	1870年	不详
武汉	大堤口天主堂(后圣默多堂)	1847年初建	传教士江德成(E.Caitassace)改建
	圣若瑟堂	1876年	传教士余作宾(A.Vaudagna)
	鄂东代牧区主教公署	约1870年代	传教士江德成(E.Caitassace)
南京	石鼓路天主堂	1870年	不详
广州	石室天主堂(圣心堂)	1863-1888年	(法)盖勒明(Guillemin)
香港	圣约翰教堂	1849年	不详

^[5] 王绍周：《中国近代建筑图录》，305页，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9

3、教堂主要建筑形式

中国近代教堂建筑样是主要表现为巴洛克式和哥特式，从规模和数量上看，以哥特式为更主要。此外，还存在至于哥特式和罗马风式之间的形式。

• 哥特式教堂

哥特式教堂为数最多，大小规模均有。天主教大教堂多采用双钟塔形式，如北京西什库教堂，是北京最大的天主教堂，1888 年建成。正面直立两个钟楼，平面为拉丁十字形，石灰三合土基础，青石墙基，墙身全用城砖砌造。由于采用中国建筑材料，并由中国匠人施工，故木雕、砖雕、石刻中都富有中国的韵味（图 5-7，北京西什库天主教堂北堂外观）。

上海徐家汇天主堂，是上海最大的天主教堂。1847 年筹建，1890 年后在老堂西南面建造新堂，1896—1910 年间建成，教堂大门朝东，正门两侧有高耸的钟楼。墙身主要为红砖砌筑，墙基勒脚一部分用青石，发券和窗棂都用高直式尖顶，线脚、装饰、雕刻都用大理石做成。堂内有大小楹柱 64 根，一根大柱子用十根小圆形柱子拼合而成，用金山石精雕细凿，费时六年始告完工。平面呈十字形，设祭堂十九座，大堂可容纳四千余人（图 5-8，上海徐家汇天主堂外观）。



图 5-7，北京西什库天主教堂北堂外观



图 5-8，上海徐家汇天主堂外观

青岛圣弥爱尔教堂，1933 年建成。由于建在离海不远的高地上，教堂的体量又很高大，所以形成了青岛市一个很醒目的建筑。平面为一般教堂通用的长十字形，钢筋混凝土砖石混合结构，屋顶为三角拱钢架，但天花和塔楼都为钢筋混凝土结构。但细部简单，又夹杂了一些其他手法（图 5-9，青岛圣弥爱尔教堂外观）。室内装修为意大利古典形式，基本是粉刷装修，很少用高级材料。

规模较小的教堂多采用单钟塔形式，如上海玫瑰天主堂（1898年）、高雄天主教玫瑰圣母堂（1862年）、上海洋泾浜天主堂（1861年，图 5-10，上海洋泾浜天主堂）等。



图 5-9, 青岛圣弥爱尔教堂外观



图 5-10, 上海洋泾浜天主堂

正立面以单钟塔构图为主的哥特教堂也十分普遍，如上海第一代圣三一教堂俗名红礼拜堂，是上海最早的一座基督教堂，建于 1866—1869 年，为当时远东有名的基督教会之一。墙壁用红砖砌成，堂四周有彩色玻璃窗，花窗镶嵌彩色圣母像，玻璃堂内外有带拱券的石柱长廊，内部有高敞的尖拱顶，祭台雕刻精细。该堂仿照西欧十三世纪 高约 17 米，教堂平面为长方形。

1893 年在堂北侧增建钟塔，内置八音大钟，能按圣诗音韵打钟礼拜。礼拜堂用八千多根木桩做基底，钟塔用五米多长的木桩 625 根，并于木桩顶上铺花岗石用以加固基础。礼拜堂四周草木茂盛，在稠密的商业区中显得宁静幽雅（图 5-11，第一代上海圣三一教堂）。

天津望海楼天主堂建成于 1870 年，半年后被焚毁。1897 年在原址重建，又于 1900 年义和团运动中被烧毁。该教堂虽几经重建，但其基本形制无多大变化。教堂平面长方形，出塔楼外大部分为二层，砖木结构，前立面朝西南，中部为高耸的塔楼，两侧有扶壁，塔楼上部为平顶。后礼拜堂四角有小角楼。清砖墙面，外形具有哥特式建筑的风格（图 5-12，天津望海楼天主堂）。



图 5-11, 第一代上海圣三一教堂



图 5-12, 天津望海楼天主堂

• 巴洛克式教堂

巴洛克风格的作品主要以上海董家渡教堂（图 5-13，上海董家渡教堂正立面）、北京南堂（1904 年，图 5-14，北京天主教南堂正立面）武汉圣约瑟天主堂（1876 年）为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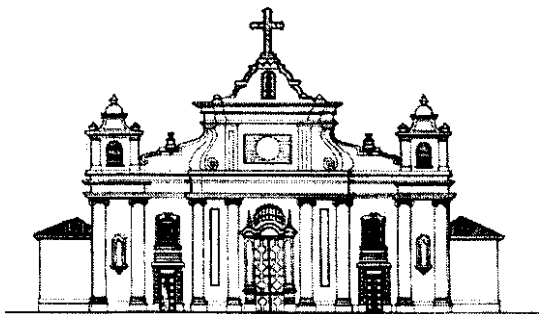


图 5-13, 上海董家渡教堂正立面



图 5-14, 北京天主教南堂正立面

• 其他

其他还有一些教堂建筑形式具有多种西方建筑风格与传统建筑融合的特点。如罗马风往往与哥特样式并存，半圆形券和巴西利卡式立面是突出特征，以上海第二代圣三一教堂为代表。还有如上海佘山天主堂和天津老西开天主堂等，具有文艺复兴罗马风、拜占庭等多种西方建筑风格与传统建筑融合的特点。

上海佘山天主堂（图 5-15，佘山天主教堂外观），1871 年耶稣会集款动工兴建，当时作十字形，采用中西混合式建筑式样。后于 1925 年拆除重建新堂。外墙用红

砖，墙身下部用金山石砌筑，窗顶都为圆弧形，檐部处理用半圆券，其外观基本上为文艺复兴罗马风的形式。平面基本长方形，东侧有方形翼部，东侧设楼梯。大堂长 55.81 米，宽 24.68 米，净高 16.46 米，可容纳三千余人。西向设正祭坛，用镶金嵌装的大理石雕成。祭坛与座堂间用低矮的汉白玉栏杆分割。堂四周有镶嵌彩色圣母像的玻璃窗。楼上为主教卧室。钟楼在大堂西南角，顶上耸立一尊铜铸圣母像，高 4.8 米。

天津老西开天主堂，从 1914 年到 1916 年，老西开建造了主教府、大教堂、修女院等。其中教堂平面呈长方形，入口左右有塔楼，上设穹窿顶。外墙处理用半圆叠涩拱窗及檐下连续拱券，外观造型采用法国罗马式建筑的处理手法（图 5-16，天津老西开天主堂）等也表现出罗马风特征，二者都带有橄榄性穹顶，又具拜占庭风格。



图 5-15，余山天主教堂外观



图 5-16，天津老西开天主堂

此外，还有一些教堂建筑形式中表现出明显的地域风格，俄罗斯风格的东正教堂数量最多，以哈尔滨的圣索菲亚教堂（1932 年）和圣尼古拉教堂为代表。

“圣尼古拉教堂”，既哈尔滨中央寺院，建于 1901 年，俗称“喇嘛台”。它位于南岗中心广场处，平面八角形，用原木井干式墙壁，木构承重。屋顶处理有四个八角形攒尖顶，中间更突起一最高坡顶，气势磅礴。外观是俄罗斯十五、六世纪窝罗奇哥式木构教堂的翻版。教堂位于城中高岗，为当时全市的制高点，正对大街，十分醒目（图 5-17，哈尔滨中央寺院）。

上海东正教堂，建于 1931 年，是较典型的俄罗斯教堂形式。平面外形基本上为方形，内部平面做十字形布置。立面厚墙小窗，屋顶用尖顶及鼓形座，在尖顶上再立十字架并涂金色，与孔雀蓝的尖拱顶相衬托。墙面为黄灰色的面砖。室内多俄

罗斯教堂内常用的油彩画，并有大吊灯，形式比较特殊（图 5-18，上海东正教堂）。



图 5-17，哈尔滨中央寺院



图 5-18，上海东正教堂

19 世纪末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出现以后，部分教堂建筑转向“中国式”。如上海鸿德堂（1928，图 5-19，上海鸿德堂）和北京救世军教堂（图 5-20，北京救世军教堂）。北京救世军教堂，建于 1920 年。建筑三层，在右端高耸三层中国宝塔式钟楼，左端是歇山式大屋顶，入口处采用中国式门廊。整座建筑形式奇特。



图 5-19，上海鸿德堂



图 5-20，北京救世军教堂

5.3.1 陕西与国内其他地区教堂建筑形式的比较

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尤其是与沿海、沿江（长江）、沿边（别界）等交通和经济较发达的地区相比，陕西基督教堂的建筑形式较为简单，很少有较为正规的西式教堂建筑形式，体现出了更多的传统建筑形式与西方建筑形式融合的特点。

以基督教堂建筑形式的发展过程来看，陕西的基督教堂建筑经历了最初的沿用

中国旧式房屋改建或运用传统建筑方法新建的“中国式”基督教堂,到后来一些西方传教士开始设计的“西式”教堂的发展过程。

但这些“西式”教堂,一般都是由外国传教士自己设计绘图,极少经过正规建筑师设计,又为了适应就地取材和采用中国传统的建筑技术而由中国工匠加以修改。一位传教士这样描述当时的窘境:“1850年4月1日,为筹建新堂,已劳烦数月,因本地工匠不谙西式建筑,须亲自规画。我等来华,非为营造事业也,因情势不得不然,遂凭记忆之力,草绘图样,鸠工仿造。”^[6]

这种由非专业的外国传教士“记忆之力,草绘图样,鸠工仿造”,由当地建筑工匠承建的“西式”教堂更多体现的是西方建筑形式与当地传统融合的特点,陕西的大部分基督教堂的建筑形式都属于此类。

而在国内其他地区,在经历了最初的“中国式”基督教堂和其后的具有中西合璧特点的“西式”教堂以后,出现了明确采用正规西方教堂样式的正规西式教堂建筑。这些比较正规的西式教堂大多由具有艺术素养的西方传教士设计,少数由传教士按照从本土带来的设计图纸指导建造,或者直接委托本土著名建筑师设计。^[7]在19世纪末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出现以后,还有部分教堂建筑转向“中国式”。

在国内其他地区,尤其是沿海、沿江(长江)、沿边(边界)地区,在鸦片战争开埠以后,西方宗教的传入表现出胜利者的姿态。另外,为了在中国从事长期的传教事业,他们建筑的教堂也就更希望建造成欧洲的传统式样。因此,无论是租界内为西方侨民服务或是面向中国人的教堂都明确采用正规西方教堂样式,教堂成为宗教精神的象征。

在这些正规西式教堂的设计者中,有谙熟西方建筑艺术的传教士,中国传统文化冲突的传教政策相反,开埠后西方宗教的传入表现出胜利者的姿态,无论是租界内为西方侨民服务或是面向中国人的教堂都明确采用正规西方教堂样式,教堂成为宗教精神的象征。因此,在中国的是沿海、沿江(长江)、沿边(边界)地区,这一时期建造的大量基督教堂的建筑形式都是比较正规的西方建筑形式。

这些正规西式教堂,有的是由谙熟西方建筑艺术的传教士仿造欧洲教堂建造的,也有的是由专业的欧洲本土建筑师设计。例如董家渡天主堂,正式名称为方济各·沙勿略教堂(Francico Xavier Church),是由天主教传教士范廷佐(Ferrand Jean)仿造罗马耶稣会大学的圣·依纳爵大教堂设计的。范廷佐神父曾长期考察罗马的建筑与艺术并深受其影响,具有一定的西方建筑艺术造诣。而与董家渡天主堂同时期

^[6] 董丛林:《龙与上帝——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115页,三联书店,1992

^[7] 伍江:《上海百年建筑史(1840-1949)》54页,同济大学出版社,1997.5

建造的圣三一堂 (Holy Trinity Church) 则是聘请了英国本土的著名建筑师史浩德 (George Gilbert Scott) 和凯德纳 (William Kidner) 设计。史浩德是当时英国著名哥特复兴建筑师, 而凯德纳作为当时上海唯一的一位具有英国皇家建筑学会 (RIBA) 会员身份的建筑师和工程师, 负责了教堂的现场施工与设计修改工作。

[8]

因此, 陕西的基督教堂建筑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 平面与空间形式比较简单。平面大多为长方形, 有的在前部祭坛两侧伸出两个小的祭堂, 呈拉丁十字形平面。教堂内部一般多为简单的长方形空间, 有的内部长方形的空间由纵向的两列木柱分为三个部分, 中间较高, 两边的侧廊较低, 内部空间近似于三廊型的巴西利卡 (图 5-21, 三原县城天主教堂内部空间)。

国内其他地区的正规西式教堂的平面与内部空间形式也比较复杂。如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平面呈十字形, 设祭堂十九座, 大堂可容纳四千余人。堂内有大小楹柱 64 根, 一根大柱子由数根小圆形柱子拼合而成, 由多根柱和多个大小拱券构成了复杂的内部空间 (图 5-22 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内部空间)。



图 5-21, 三原县城天主教堂内部空间



图 5-22 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内部空间

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 陕西的基督教堂建筑的外部形态与装饰也体现出了较多的与传统建筑交融的特点。例如西安市五星街天主教堂正立面为具有巴洛克式风格, 三开间、二层, 双柱叠柱式, 顶部以巴洛克曲线做为结束。线角丰富, 花饰精美, 其中很多细部花纹揉入了中国传统建筑的细部纹饰。东立面二侧凸出的二个小室为中国传统建筑风格, 其余四个凸出的小室也均为中国传统建筑形式。主入口饰有字匾楹联。墙面砖雕纹饰与贯穿于整个建筑内外的细部装饰更多的渗透出中式风格 (图 5-23, 西安市五星街天主教堂外观), (图 5-24, 西安市五星街天主教堂细部纹饰)。

[8] 伍江:《上海百年建筑史(1840-1949)》59页, 同济大学出版社, 1997.5



图 5-23 西安市五星街天主教堂外观



图 5-24, 西安市五星街天主教堂细部纹饰

国内其他地区的正规西式基督教堂的教堂外部形态与装饰几乎是完全模仿欧洲的教堂。例如上海董家渡天主堂（图 5-25，董家渡天主堂外观），是由天主教传教士范廷佐仿造罗马耶稣会大学的圣·依纳爵大教堂设计的^[9]，反映出比较纯正的意大利巴洛克式建筑风格。上海佘山天主教堂是由葡萄牙籍传教士叶肇昌（Rev. Fr. Fancis Diniz）设计，其外部形式是以罗马风（Romanesque）为主的折衷式（图 5-26，上海佘山天主教堂外观）。



图 5-25，董家渡天主堂外观



图 5-26，上海佘山天主教堂外观

另外，有一些教堂具有地域性的教堂建筑形式，如东正教教堂，由于东正教没有传入陕西，因此在陕西没有出现过。而在国内如哈尔滨、上海等的其他地区，就建造了一些具有明显俄罗斯东正教建筑风格的东正教教堂（图 5-27，上海东正教堂）

^[9] 路秉杰：《上海的教堂》 新建筑，1986.3

(图 5-28, 上海圣尼古拉斯教堂)。



图 5-27, 上海东正教堂



图 5-28, 上海圣尼古拉斯教堂

5.2 陕西基督教堂的建筑技术特征

5.2.1 陕西基督教堂的建筑材料与结构技术

陕西地处西北内陆、经济也不发达,限于交通以及经济等多方面的原因,教堂建筑多采用陕西当地传统的砖、木、石、瓦、土坯等建筑材料,如木材、青砖、小青瓦等。在陕北的一些地区,也会直接采用黄土作为建筑材料,建成窑洞的形式。

陕西传统建筑的结构体系是“以木构架作为房屋骨架的砖木和土木房屋”^[10]这种结构,以木构架作为房屋骨架,承受房屋重量,墙与骨架脱开,只承受自重并作围护和分割空间之用,称之为“墙倒屋不塌”。中国传统木构架结构主要有抬梁式和穿斗式两种,陕西的传统建筑中这两种结构都有使用。中国传统木结构在力学上侧重垂直方向上的平衡,柱、梁、斗拱等主要构件都是承受垂直方向上的作用力,斜向受力构件,如叉手等则较少使用。

在陕西的教堂建筑中,大多没有采用这种传统的整体木构架结构体系,而是普遍采用了砖墙木屋架的结构体系,即砖木混合结构。陕西教堂的砖木混合结构大体有两种:一种是砖墙和室内的木柱共同承重,如高陵县通远坊天主教堂;另一种是

^[10] 张壁田、刘振亚:《陕西民居》89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3.9

砖墙加西式三角形木屋架的结构形式，如三原县城基督教堂。这种西式三角形木屋架不同于传统木结构在力学上侧重垂直方向上平衡的特点，它是以三角形的稳定性原理为特征的，受力状况优于传统结构方式，而且较为节省材料^[1]（图 5-29，北方抬梁式大木构件）（图 5-30，西式三角屋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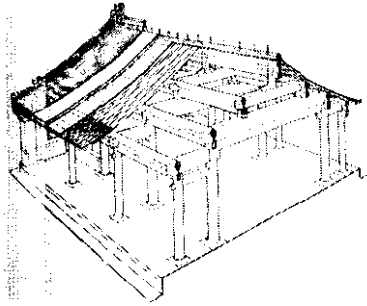


图 5-29，北方抬梁式大木构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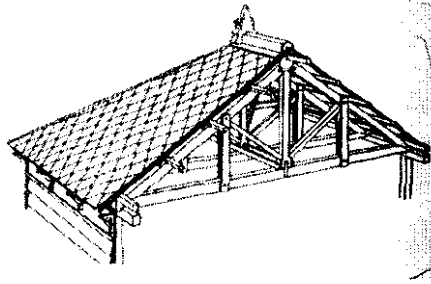


图 5-30，西式三角屋架

砖木混合结构由于墙作为承重构件，因此墙体一般都很厚。在一些教堂建筑中，如三原县城基督教堂，甚至采用了双层墙，这一方面是结构承重的需要，另外也有利于采暖保温。

陕西教堂建筑在结构上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大量的使用拱券。券的使用必须使用砖石砌块。虽然砖的制作和使用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从战国时期开始，主要用于陵墓、塔、城墙等建筑之中，有空心砖、条砖、楔形砖、饰面砖等多个种类，但是在明代以后砖才开始大量用于一般性建筑，但是受传统木结构建筑体系的影响，砖一直不式中国传统建筑中的主要材料，砖作的重要性远低于木作。中国传统建筑中除了拱桥以外，很少使用拱券。



图 5-31，三原县城天主教堂内景



图 5-32，高陵县通远坊天主教堂窗洞

^[1] 沙永杰：《“西化”的历程——中日建筑近代过程比较研究》，149-158 页，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11

但是在教堂建筑中，拱券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运用，砖券主要有半圆券、弧券、平券三种，用砖券作外廊或门窗过梁，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传统的石、木过梁（图 5-31，三原县城天主教堂内景）（图 5-32，高陵县通远坊天主教堂窗洞）。陕西的基督教堂建筑大都采用这种“技术简单，取材方便，而且经济的结构方式”。

5.2.2 国内其他地区的基督教堂的建筑材料与结构技术

在沿海、沿江（长江）、沿边（别界）等交通和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教堂除了采用当地传统的砖、木、石、瓦等建筑材料以外，还使用了一些新的建筑材料，如钢材、彩色玻璃、钢筋混凝土等。在上海的一些规模较大的教堂建筑中，还采用了汉白玉、金山石、花岗岩、大理石甚至镶金等昂贵的建筑材料。

这些基督教堂大量采用了西方传统的砖石墙承重和木屋架屋盖的结构形式。在这些教堂建筑中，砖石柱廊、砖石拱券等传统中国建筑中不常见的结构得到很大发展。半圆券、弧券、平券等各类拱券在柱廊、门窗洞等处被大量使用。

在上海的一些规模较大的教堂建筑还采用了木桩基上铺石板作为基础以解决由于上海地质松软而带来的建筑沉降。1869年建成的上海圣三一堂，在1000余平方米的面积上竟用了8000多根木桩作基底。1883年加建的该教堂钟塔仅100平方米左右的面积上也用了5米多长的木桩达625根。^[12]这一方面表明了当时结构基础计算的保守，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当时桩基在建造过程中已是非常重要的基础工程。

5.2.3 陕西与国内其他地区建筑技术的比较

陕西地处西北内陆、经济也不发达，限于交通以及经济等多方面的原因，无法像沿海、沿江（长江）、沿边（别界）那些交通和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一样从国外直接引进先进的建筑材料与结构技术。因此，陕西基督教堂的建筑材料大多是就地取材，建筑结构形式也大多是比较简单经济的砖木混合结构。

陕西的基督教堂建筑多采用陕西当地传统的砖、木、石、瓦、土坯等建筑材料，如木材、青砖、小青瓦等。在陕北的一些地区，甚至会直接采用黄土作为建筑材料，建成窑洞的形式。教堂建筑通常采用青砖或土坯砖墙体、木屋架、木柱或砖柱、内部多为抹灰墙面，很少使用豪华的装饰材料。一般的西式教堂多用土坯砖或青砖砌

^[12] 中国建筑史编委会：《中国建筑简史》，135页，中国工业出版社，1962

筑，屋顶为木屋架，上覆以传统的小青瓦，由于是墙体承重结构，所以墙体很厚，有的墙体外面覆以白色的灰泥或粉刷。

在交通和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教堂除了采用当地传统的砖、木、石、瓦等建筑材料以外，还使用了一些新的建筑材料，如钢材、彩色玻璃、钢筋混凝土等，有些建筑材料甚至直接从国外运来的。在一些规模较大的教堂建筑中，内部装饰还采用了汉白玉、金山石、花岗岩、大理石甚至镶金等昂贵的建筑材料。

陕西的教堂建筑中，普遍采用了砖墙木屋架的结构体系，即砖木混合结构。陕西教堂的砖木混合结构大体有两种：一种是砖墙和室内的木柱共同承重，如高陵县通远坊天主教堂（图 5-33，高陵县通远坊天主教堂室内）；另一种是砖墙加西式三角形木屋架的结构形式，如三原县城基督教堂（图 5-34，三原县城基督教堂木屋架）。



图 5-33，高陵县通远坊天主教堂室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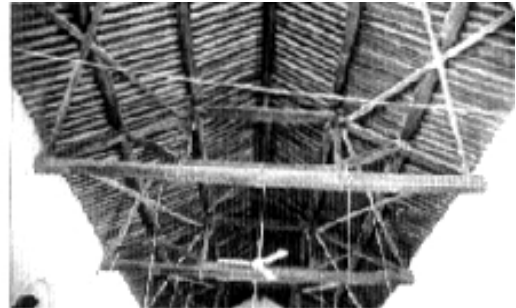


图 5-34，三原县城基督教堂木屋架

国内其他地区的基督教堂最初也大量采用了西方传统的砖石墙承重和木屋架屋盖的砖木混合结构形式。进入二十世纪以后，随着砖木混合结构建筑技术的发展，建筑风格向正规西方样式的转变，出现了并逐渐完善了砖石钢骨（筋）混凝土混合结构和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在某些教堂建筑中还采用了桩基础的结构方式。

在陕西和国内其他地区的教堂建筑中，拱券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运用。在这些教堂建筑中，砖石柱廊、砖石拱券等传统中国建筑中不常见的结构得到很大发展。半圆券、弧券、平券等各类拱券在柱廊、门窗洞等处被大量使用。用砖券作外廊或门窗过梁，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传统的石、木过梁。

可是陕西教堂建筑中的拱券结构比较简单，大多是代替传统的石、木过梁以及用在门窗洞等处（图 5-35，三原县城天主教堂内景）。其他地区的一些教堂建筑中运用了骨架券、十字拱、飞券、二圆心的尖券和尖拱等较为复杂的拱券结构（图 5-36，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内景）。



图 5-35, 三原县城天主教堂内景



图 5-36, 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内景

5.3 小结

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尤其是与沿海、沿江(长江)、沿边(别界)等交通和经济较发达的地区相比,陕西基督教堂的建筑平面与空间形式比较简单,建筑的外部形态与装修体现出更多的传统建筑与西式建筑形式的融合的特点。在建筑材料上,陕西基督教堂建筑大多采用当地传统的建筑材料,结构技术水平也比与国内其他交通和经济较发达的地区落后。

就建筑形式而言,陕西没有较为正规的西式教堂,还有一些教堂形式没有在陕西出现过。这是因为,陕西的基督教堂建筑大都是由非职业建筑师的外国传教士的设计主持修建的,他们大多没有受过专业的建筑学训练,因此至多是在样式上反映出西方特色,其设计则与西方正统建筑学相去甚远,建造出来的教堂建筑自然也非西方正统建筑形式。

而在其他地区则出现了一些较为正规的西式教堂,他们一般都经过较为正规的建筑设计。这其中有两类:一类是由熟悉西方建筑学的传教士自己设计;另一类是由教会聘请欧洲本土的建筑师来设计。但是不管哪一类,建造者和设计者都力图将这些教堂建成真正的欧式建筑,为此他们甚至常常直接模仿欧州的某一个教堂来建造。另外有一些教堂建筑形式,如东正教教堂,因为东正教没有传入陕西,因此在陕西没有出现过。

就建筑材料和结构技术而言,陕西基督教堂建筑材料也比较单一,大多是就地取材;建筑结构形式也比较简单也比较经济。这也是由于陕西不甚发达的交通和经济条件所决定的,无法像沿海、沿江(长江)、沿边(别界)那些交通和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一样从国外直接引进先进的建筑材料与结构技术。

尽管陕西的基督教堂无论是在建筑规模、建筑数量、建筑材料、建筑质量以及

西化的程度上都无法与那些沿海、沿江（长江）、沿边（别界）交通和经济较发达的地区的基督教堂相比。但正是由于如此，使得陕西的基督教堂建筑比起那些使用西方建筑材料、建筑技术，甚至全盘照搬的西式教堂建筑来说，更加具有中西交融的特点。陕西的教堂建筑运用当地传统的建筑材料、当地的结构技术、当地传统的施工作法来建造西式的教堂，反映了基督教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冲突与交融的特点。

6. 陕西教堂建筑所体现的受异域文化影响的特征

陕西在中国历史和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史上所具有的重要而特殊的地位,使得陕西的基督教堂建筑在异域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双重影响之下,形成了一些独特的建筑特征。古代基督教首次传入中国就在长安建造了中国第一座基督教堂,自此之后,随着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几度兴衰,陕西的教堂建筑也经历了 1300 多年的发展变化过程。特别是明朝末年以来,天主教在陕西的传播;以及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新教大规模的传入陕西,在陕西建造了大量的教堂,其中有一部分保存至今,并基本保持了初建时的原貌。通过对这些保留下来的教堂建筑的研究,进而对于陕西教堂建筑所体现的特征及其渊源进行探讨。

6.1 陕西特殊的文化结构体系

陕西是华夏民族祖先世代生息、繁衍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早在五千年前的黄帝时代,这里已进入了世界远古文明的行列,不断地向周边地区扩散并传播文明。种种史实表明,早在远古至战国时期,陕西地区的对外交往就已经开始萌芽并且日渐兴起。直至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陕西与世界多个国家,尤其是亚洲各国的政治往来以及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密。隋唐是陕西对外交往的兴盛时期。尤其是在盛唐时期,长安作为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市,与亚洲、欧洲、甚至非洲等地区都有极为密切的经济及文化交流。

但是自唐以后,随着经济与政治中心的南移,长安失去了国际大都会的中心地位。另外,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日益拓展兴盛,长安作为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交往的门户地位也逐渐被南方港口城市所取代,陕西对外交往因此也进入了漫长的保守时期,对外交往时断时续。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并且缓慢的发展。鸦片战争以后直至新中国成立,陕西的对外交流也经历了从被动屈辱的接受西方文化,到自觉、自愿、自主的对外交流的历程。

陕西是中华民族文明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传统文化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西方文化从中国沿海登陆经过辽阔的中国领土进入内陆腹地的陕西,其进攻势头已被弱化,不能不对陕西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有所妥协与让步。中西文化两者之间的冲突因此而得以弱化,产生某种微妙的平衡,呈现出一些中西建筑文化互相渗透混

杂的特征。体现在教堂建筑上，就是教堂建筑的“本土化”特征。

6.2 受异域文化影响是一个自觉与不自觉的过程

虽然从主观上来讲，陕西的教堂建筑与陕西当地的传统建筑相遇于某种程度上的民族矛盾的氛围之中，但是从客观上讲，既然是两种不同文化的相遇，就不可避免的要发生相互间的影响。而且，由于这种相遇是西方建筑文化来到传统的中国土壤之上，这种不可避免的影响也是一种自觉与不自觉的过程。

首先，教堂的建造必须雇用中国的建筑工人与工匠。外国传教士来到建造教堂，虽然设计图可以由这些传教士自己依照自己的记忆比葫芦画瓢的绘制出来，亦或是直接依照自己的记忆指挥建造。但是，要把教堂建造起来还得依靠当地的建筑工匠。这就必然导致中国工匠把中国传统建筑中的许多建造方法和经验运用到西式教堂的建造中去。

第二，这一点似乎也是更为重要的，就是在这些西式的教堂建筑中必须采用当地的建筑材料和当地的施工技术条件。当时来到陕西的外国传教士不具备这样的财力，也不可能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从中国以外的地方带来建造教堂所需的建筑材料，当然也没有这个必要。因而他们设计和建造的教堂建筑必然“为了适应就地取材和采用中国传统的建筑技术而由中国工匠加以改造”后才能最后建造起来。

这样一来，至少在材料和施工方法上，这些早期的教堂建筑已经开始同古老的中国建筑文化相融合。比如当时很多的西式教堂建筑的屋面都采用了中式小青瓦屋面，而墙身则采用了传统的青砖外墙。

第三，也有一些西式教堂建筑在形式上主动的与传统中国建筑相融合。为了要用建筑这一形象的语言向当地民众宣扬西方文化、赢人信教，一些西洋传教士设计建造西式教堂。但是与此同时，为了能在传统建筑文化浓厚的内陆地区陕西站稳脚跟，为了获得当地居民的好感，消除民众对洋人洋教的敌对情绪，他们也有意识的在西式教堂建筑中加入一些中国传统建筑元素。这种教堂的一般特点是：整体的造型比例与构造方式为西式建筑，而细部装修则往往夹杂中国传统建筑手法。比如在陕西的教堂建筑中，很多就运用了中国的匾额、楹联作为立面的装饰。

6.3 在受异域文化影响而不易改变的传统观念

中国人虽然接受西方文化，但却常常以中国式的观点看待外来事物。这也许可

以归因于民族性。中国人的传统习惯很难改变，就建筑来讲，他们接受了西式建筑，但却并非全盘形的吸收，而是用自己传统的观念重新解释了外来的建筑语言。

陕西是中华文明的发源的之一，也曾是十几个封建王朝的都会所在地，具有相当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由于地处内陆的地理环境和几千年恪守演习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又加之长期的闭关自守，在一个相对封闭的文化环境中缓慢发展。因此，传统的观念在民众的意识中更是根深蒂固、不易改变的。本地的民间工匠，正是由于这种内在不易改变的传统观念，在建造西式的教堂建筑时，自觉与不自觉的运用传统的文化、美学、伦理观念对西式的建筑元素进行取舍、变化。因此陕西的教堂建筑就呈现出一种自然的、可以为一般大众所接受的中西融合方式。用传统的观念来对西式的建筑作以诠释。

在另一方面，对于外国传教士来说，为了在这里生根立足，教会也采取了适应中国习俗、迎合中国人心理、柔化中国人对立情绪的传教政策，这就是传播基督教的“适应迎合论”。^[1]传教士着华服、说华语、取华名、遵守中国礼仪以及《圣经》与儒、释、道家经典相结合等现象背后都受着这一共同思想的支配。这种“迎合适应论”的传教政策也很自然的为地方传统与外来形式的融合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与可能性。这种“迎合适应论”体现在教堂建筑上，其具体表现形式就是西式教堂建筑与陕西传统建筑形式的互相结合。

陕西地区几千年延续下来的传统文化与地处内陆的地理环境和几千年恪守演习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造成了一个比较封闭的文化环境，形成了人们很难轻易改变的传统观念。对于西方建筑文化的接受是表层的、外在的，因此西方的教堂建筑经过传统观念的重新诠释，形成了非常复杂且耐人寻味的中西合璧的特点。可以说，西方传教士为了达到传播西方宗教及西方文化的目的，“入境随俗”是一种必要的手段，这为这种建筑的融合提供了可能性与良好的条件。

但是，同时这也是由于国人受异域文化的影响而不易改变的传统观念所造成的。用传统的观念建造西式的教堂，这使得陕西的教堂建筑具有了外来影响和传统延续的双重特征，也可以说是一种在特定环境和条件下自然产生的中西合璧。

6.4 小结

本章从陕西特殊的文化结构体系、受异域文化影响是一个自觉于不自觉的过程以及外在受异域文化影响而不以改变的传统观念这三个角度探讨了陕西教堂建筑

^[1] 董丛林：《龙与上帝——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203页，三联书店，1992

所体现的受异域文化影响的特征。西方的建筑文化来到陕西的土壤之上，由于其根植的物质土壤与精神土壤都发生了变化。为了适应并在这片土壤上面得以发展壮大，因而不得不作一些变异与融合。这种变异与融合是陕西教堂建筑受异域文化影响的特征的具体体现。

7. 陕西教堂建筑所具有的意义

教堂建筑在建筑史特别是西方建筑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国的教堂建筑在建筑史上也占有特殊的地位，尤其是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中国近代教堂建筑是正统欧洲建筑文化传入中国的重要领域，尤其是在近代早期。陕西的教堂建筑，尤其是明清以及近代以来的教堂建筑，在建筑、城市、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等多个方面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7.1 陕西教堂建筑在建筑方面所具有的意义

首先，从时间上来讲，自古代基督教于唐贞观年间（公元 635 年）首次传入中国，并在长安建造了中国第一座基督教堂，此后随着基督教与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几度兴衰，陕西的教堂建筑也经历了 1300 多年的发展变化过程。基督教在中国的四次主要传播都在陕西建造了教堂，陕西的教堂建筑的历史发展过程是中国教堂建筑发展史的缩影，在中国建筑史上也具有一定的地位，陕西的教堂建筑也是我们进行建筑史研究的宝贵物证。

第二，陕西地区几千年延续下来的传统文化与地处内陆的地理环境和几千年恪守演习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造成了一个比较封闭的文化环境。在这样的情况下，教堂建筑是陕西建筑“西方化”的开端，对陕西近代建筑也造成了较大的影响。由于地处内陆腹地，从明清时期直至 1934 年陇海铁路修通以前，教会一直是西方建筑文化传入陕西的主要力量。而教堂是教会最主要、最典型，同时也是最具西方文化特色的建筑类型，陕西地区最早出现的西式建筑就是教堂建筑。

特别是明朝末年以来，天主教在陕西的传播；以及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新教大规模的传入陕西，在陕西建造了大量的教堂建筑。这些教堂是西方建筑传入陕西并于传统建筑融合的重要领域，对陕西建筑尤其是近代以来的建筑造成了技术、观念等多方面的影响，在陕西建筑的近代化历程中起到过极其重要的作用。

就建筑形式而言，陕西教堂建筑引入的西方建筑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陕西传统建筑面貌。在建筑立面构图形式上，陕西教堂建筑突破了原有的由台基、屋身、屋顶所构成的横向三段式传统建筑立面构图（图 7-1，三段式传统建筑立面构图），采用了西方教堂建筑的一些立面构图。如西安市五星街天主教堂采用了巴洛

克式的立面构图手法，运用了叠柱、双柱、四分之三柱等手法，突出了立面的垂直划分，追求强烈的体积与光影变化。三原县城基督教堂则采用了哥特式的典型立面构图：一对钟塔加着中厅的山墙，垂直的分为三部分。渭南教区南白圣母无染原罪堂突出立面垂直的划分，同时使用了传统的建筑细节（图 7-2，渭南教区南白圣母无染原罪堂）。这几座教堂建筑突出了立面的垂直划分，这与横向三段式传统建筑构图有很大的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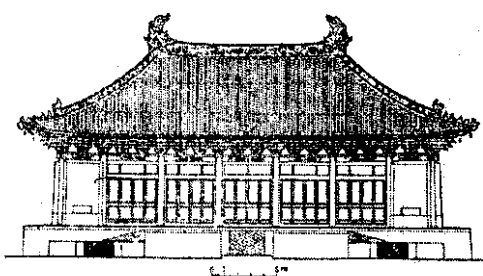


图 7-1, 三段式传统建筑立面构图



图 7-2, 渭南教区南白圣母无染原罪堂

陕西教堂建筑的这种大大不同于传统建筑的立面构图形式后来在陕西其他的建筑类型如时的一些商业店铺和私宅官邸等建筑中也有使用，改变了在此之前几乎是传统建筑立面构图一统天下的陕西建筑面貌。另外，教堂建筑引入的一些西方建筑元素，例如拱券、西式柱头、山花装饰等等，也被当地的工匠所模仿运用到民居店铺等建筑中，改变了一些陕西建筑的传统面貌（图 7-3，西安五星街天主教堂立面细部）。

就建筑技术而言，陕西教堂建筑中大量采用的砖木混合结构方式大量流传，“使传统木作技术的主导地位趋于衰微”，及至“清代至民国时期，陕西西安传统建筑由砖墙、砖柱承重取代木构架承重”。^[1]在此之前，陕西传统建筑的结构体系是“以木构架作为房屋骨架的砖木和土木房屋”这种结构，以木构架作为房屋骨架，承受房屋重量，墙与骨架脱开，只承受自重并作围护和分割空间之用。

陕西教堂建筑主要的结构形式为砖木混合式，这种结构形式大体有两类：一种是砖墙和室内的木柱共同承重；另一种是砖墙加西式三角形木屋架的结构形式。陕西教堂建筑引入的这种砖墙木屋架承重结构，在近代以后逐渐取代了传统的整体木

^[1] 张壁田、刘振亚：《陕西民居》92 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3.9

构架承重结构。



图 7-3, 西安五星街天主教堂立面细部



图 7-4, 西安市东新巷礼拜堂窗洞

陕西教堂建筑在结构上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大量的使用拱券。券的使用必须使用砖石砌块。虽然砖的制作和使用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但是在明代以后砖才开始大量用于一般性建筑,但是受传统木结构建筑体系的影响,砖一直不是中国传统建筑中的主要材料,砖作的重要性远低于木作。中国传统建筑中除了拱桥以外,很少使用拱券。^[2]但是在教堂建筑中,拱券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运用,砖券主要有半圆券、弧券、平券三种,用外廊或门窗过梁,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传统的石、木过梁,在柱廊、门窗洞等处被大量使用。(图 7-4, 西安市东新巷礼拜堂窗洞)。

虽然陕西的基督教堂与国内其他较为发达的地区相比而言,建筑规模较小、建筑质量较差、建筑的技术水平也较低。但是对于陕西这个内陆省份来讲,教堂建筑带来了新的建筑形式,是陕西传统建筑受到西方文化与西方建筑形式的影响的开端,也是陕西传统建筑逐渐融入西方文化与西方建筑因素,并由此逐渐走向近代建筑的重要节点。

第三,就其建筑本身而言,陕西现存的教堂建筑也具有其独特的建筑艺术价值。教堂建筑作为一种典型的外来建筑文化,出于其宗教目的,具有其特定的形制。陕西的教堂建筑在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下,形成了一种有别于东、西方传统建筑的建筑形式。在西式教堂的基础上融入了一些中国传统建筑元素,用传统的建筑材料、施工手法以及固有的传统观念来建造西式的教堂。

尽管陕西的基督教堂无论是在建筑规模、建筑数量、建筑材料、建筑质量以及西化的程度上都无法与那些沿海、沿江(长江)、沿边(别界)交通和经济较发达

^[2] 王世仁:《中国近代建筑技术的发展,王世仁建筑历史论文集》199-215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7

的地区基督教堂相比。但正是由于如此，使得陕西的基督教堂建筑比起那些使用西方建筑材料、建筑技术，甚至全盘照搬的西式教堂建筑来说，更加具有中西交融的特点。陕西的教堂建筑运用当地传统的建筑材料、当地的结构技术、当地传统的施工作法来建造西式的教堂，反映了基督教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冲突与交融的特点。

这种中西合璧的教堂的一般特点是：整体的造型比例与构造方式为西式建筑，而细部装修以及施工做法则往往夹杂中国传统建筑手法。比如用中国传统的装饰纹样来雕刻西式的柱头，用传统的飞檐戗角的做法来建造西式的钟塔，在巴洛克式立面中融入匾额、楹联等等，对西方建筑元素做以中国意义的阐述。这些兼具有异国情趣与传统建筑特色的教堂建筑，形成了其独特的建筑风格，这也就是其艺术价值所在。

此外，这些教堂建筑都对中西方建筑文化的结合做出了有意识亦或是无意识的探索。从建筑学的角度来看，尽管其中有一些还不是很成熟，甚至有些怪诞，但是对于今天的建筑设计还是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当地传统建筑工匠的这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探索和当代后现代主义者的某些观点有一些相似之处，“既用东方的，也用西方的好看的建筑元素来打扮我们的建筑”。“利用传统的部件和引进的新的部件组成独特的总体”。^[3]

当然，这两种探索并非在一个层次上，当地传统建筑工匠出于自觉不自觉所作的探索尚是初步的，也无法上升成理论。但是这些宝贵的经验，对于今后这方面的探索具有一定的价值。这些早期对于西方建筑形式以及建筑技术与当地传统的结合的尝试与探索，对于现今我们探索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建筑本土化的建筑设计具有启发与借鉴作用。

7.2 陕西教堂建筑在城市方面所具有的意义

由于地处内陆腹地，从明清时期直至1934年陇海铁路修通以前，教会一直是西方建筑文化传入陕西的主要力量，而教堂是在陕西的城市近代化历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教堂建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城市的发展历程，是城市发展变化的宝贵“印记”，这对城市发展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以西安市为例，西安市最早出现的西式建筑就是教堂建筑。始建于清康熙五十

^[3] 杨蒿林：《中国近代建筑复古初探》 建筑学报，No. 3, 1987

四年（1716年）的西安市五星街天主教堂是一座具有强烈西方的巴洛克式风格天主教堂，对当时城市面貌也有相当程度的影响。不仅是教堂建筑本身对城市面貌有所改变，与此同时，一些西方巴洛克建筑元素开始被大众所接受，并模仿使用在如店面、住宅等其他的建筑类型上面。西安当时传统的建筑工匠在建造一些民宅和店面装修的时候，就使用了西式的柱头、山花装饰，改变了当时几乎是传统建筑一统天下的城市面貌。如今我们在一些遗留至今的民宅中还可以看到这种做法。

而且教堂建筑往往不是孤立存在的，一般的都附设有修道院、外国传教士住宅、孤儿院、学校、医院等教会建筑。这些教会建筑一般也是以西式建筑为主，从而形成一个与周边地区不同的教会建筑群，对城市中这一片趋于都造成了较大的影响。例如西安市五星街天主教堂就有附属房屋158间，总面积20亩1分6厘，曾先后创办玫瑰女子中小学，若瑟男子小学，安多医院和玛丽诊所。这样一个教会建筑群包括宗教、慈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居住等多种功能，在当时形成了一个功能较多的城市区域中心。

这样的教堂建筑群在陕西的城市中曾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陕西作为一个内陆省份，没有直接被占领作为租界的地区。可是教堂及其附属建筑所形成的地区在城市中起到了一种类似租界的作用，有人说“西安的教会是小租界”。^[4]

这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这样的以教堂为中心教会建筑群是城市中外国人的聚居地。其次，为了寻求洋人势力的庇护，当地的官僚军政要人为这样的地区提供了特权，是其具有了某些类似于租界的性质。再次，这样的地区成为了教会向广大市民宣扬西方文化和西方生活方式的重镇。这样的地区除了具有宗教、慈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居住等功能以外，教会还开办了电影院、体育场馆、西餐厅、浴室等文化娱乐场所，其中甚至还有一些工业实体，如织布厂、毛巾厂、奶牛场、印刷厂。此外还有一些洋买办在其中进行进出口贸易，如包销美孚石油和瑞典火柴。

因此，这样的以教堂为中心教会建筑群在城市中形成了一个具有多种功能，有相对集中的特殊区域。这样的区域不仅享有特权，而且功能复杂，其内部的各种不同功能在不同程度上都代表了当时较为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如此集中在城市的某一个区域内，形成了“特区”。

这样特殊的区域对当时的城市影响很大，它带动了其周边地区道路交通、商业贸易等多方面的发展，对于城市的近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样的以教堂为中心教会建筑群不仅作为教徒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更在其周边形成了一系列的文化娱

^[4] 李因信：《西安市基督教会历史简编》，165页，西安市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1988.7

乐、商业贸易、工业生产场所，不仅改变了城市的外部形象，更重要的是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生活网络，是陕西城市的近代化的重要节点。

另一方面，教堂建筑作为一种比较特殊的建筑类型，也是城市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教堂建筑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与异域风情，还兼具有中西方文化交融的特色，是城市风貌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城市特色的一种体现。

从明清时期直至 1934 年陇海铁路修通以前，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大规模传入陕西，在陕西建造了大量的教堂建筑。这些基督教堂建筑带来了新的建筑形式与新的建筑技术，这些教堂是西方建筑传入陕西并与传统建筑融合的重要领域，在西安城市的近代化历程中起到过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些教堂建筑反映了明清至近代以来，陕西的城市在受到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影响之下，在其城市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沧桑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陕西城市近代化的历程。

7.3 陕西教堂建筑在文化以及社会生活方面所具有的意义

建筑是文化的载体，陕西的教堂建筑更是同时兼具宗教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双重载体。这就必然会对当地的传统文化与社会生活造成影响，同时在这些方面也具有一定的意义。

教会在进入陕西之初就同时负有传播西方宗教与西方文化、科学技术等多方面的使命。中国人对于入侵的西方外来文化感情上的抵制，同时也是对西方生活方式及审美标准的鄙视。但这并不是说随着殖民主义一起涌进的西方建筑及其所代表的西方文化最初对中国传统的建筑及传统文化丝毫没有影响，不过西方建筑文化对陕西传统建筑和文化更广泛的影响则是在更晚期的时候。这些西方的文化对人们社会生活的改变是不言而喻的。再加之教会为了使其宗教信仰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大量兴办学校、医院等社会机构，宣扬西方文化。如此一来，就对传统文化以及社会生活造成了更加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明清之际，中西方交通的通道已经变为以海路航行为主，陕西地处西北内陆，失去了交通孔道的重要位置，所以对欧洲各国的路上交往急剧减少。随着 16 世纪后叶以耶稣会传教士纷纷来华，特别是一些有文化眼光的陕西人士的大力引进，来自欧洲大陆的传教士们遂与陕西联系日渐紧密起来。^[5]

^[5] 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志，外事志》222-224 页，中国地方志丛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8

明熹宗天启五年（1625年），陕西省长安县（一说周至县）农民在耕地中除草，发现一通石碑，这就是唐德宗建中二年所刻立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该碑额上端刻有“十”字标志，由当时的大秦寺主教波斯人景静撰文。内容除记述景教教旨、教义和古罗马风土民情外，还记载了景教在中国的传播情况以及景教僧侣在唐王朝150年间的政治活动等。这年应陕西泾阳籍学人王徵的邀请，来陕主持教会活动的金尼阁成为看见该碑的第一位欧洲人，他所翻译的拉丁文碑记是欧洲国家最早的译本。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出土于陕西的消息广传，中外震惊，遂引起世界各国名流、学者、教士的兴趣和关注，视如至宝，以亲目为快。前来观光的南怀仁、汤若望、方德望、鲁德昭等人。在《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出土前，来华传教的西方传教士在陕西活动的人数既少，为时且短；此碑出土后，对陕西对外文化交流产生了直接的推动和影响。正如历史学家陈横所说：“陕西自昔为国都，西域人至者多取道敦煌，以至于陕，其为中西文明之枢纽，宜也。明季西域梗塞，西士至者多出海道至东南，与陕宜风马牛不相及。然以景教碑出土之故，西士至陕访碑者踵相接，秦晋教务，遂于东南俱。”^[6]

这些前来观光的西方传教士中有许多人留在陕西传教并主持建造教堂，如崇祯元年（1628年），前来考察此碑来历的传教士鲁德昭受命在陕西西安建立教堂；崇祯三年（1630年），传教士汤若望在陕西建立了包括西安市糖坊街天主教堂在内的两座教堂；传教士方德望于崇祯三年（1630年）来到陕西，传教足迹几乎遍布陕南，顺治十六年（1659年）于南郑逝世；同时来陕传教的还有杜奥定、南怀仁、金尼阁等人。通过陕西当地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如王征和张问达等人的介绍与引进，这些西方传教士在建造教堂传教的同时也将西方文化引入了陕西，也由此对陕西的社会生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西方传教士和教堂刚开始在陕西出现的时候，陕西人对其充满了新奇与诧异。但是除了诧异以外，还有某种程度的鄙视，认为这是“夷人”、“夷教”。当地人用异样的眼光观察着这些洋人的一举一动，甚至洋人日常生活中的琐碎细节：吃饭、修面、洗脸、阅读、睡觉都会招来人们注视的目光。因此基督教在传入陕西之初采取了“合儒”的策略，传教士以儒士姿态出现，当时新建教堂或购买私宅改建的教堂大多为“中国式”。

后来一些西洋传教士开始设计建造西式教堂。可以想象得出，在当时那样的社会心态下，当那些完全不同于习以为常的传统建筑的西式教堂出现的时候，立即会

^[6] 见陈横著：《泾阳王征传》

成为当地注目的焦点。初期的西式教堂与当地传统建筑呈现出相互对峙的局面。

这种局面后来逐渐得到改变，西式教堂所代表的西方文化被当地民众逐渐接受并且作为一种先进文化的代表对陕西的社会生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里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仰赖于陕西当地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的介绍与引进；另一方面是由于教会兴办了一些慈善事业如学校、医院等，树立了济世救人的形象，赢得了民心；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鸦片战争轰开了中国的大门，把文明古国推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国人也开始不得不接受西方列强所带来的西方文化。

陕西教堂建筑所具有的意义不仅仅是传播宗教文化，更是推动了西方科技以及文化在陕西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的陕西明清至近代以来的社会生活。当时在陕西传教的西方传教士当中有一些人对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有一定的研究。如汤若望（德国人）对于天文历法很有研究，撰有《西洋历法新书》，同时兼制象限仪、纪限仪、平悬浑仪、交食仪、列宿经纬天球、万国经纬天球、平面日晷、转盘星球、候时钟、望远镜等；杜奥定（意大利人）著有《渡海苦迹记》，是中西交通史上的重要的文献之一；南怀仁（比利时人）精通堪輿之道，著有《仪象考》、《仪象图》、《验气说》、《坤輿全图》等书；而金尼阁（法国人）著有《西儒耳目资》等书。^[7]

再加上一些当地的先进知识分子通过教会对于这些欧洲科技文化的介绍与引进，对陕西当地的科技文化曾起到过推动作用，同时也影响了当地人们的生活。

例如陕西泾阳人王征在赴京考中进士期间在京受洗加入天主教，并邀请天主教耶稣会士金尼阁来陕传教。金尼阁向王征传授了西方机械工程学知识，此外，王征在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三位传教士的指导下自制了虹吸、鹤饮、轮壶、代耕、自转磨、自行东一些有关民生日用之器，并在平时实地的使用。此后还有系统有计划的选择最适合于人民使用的机械，写出我国第一部机械工程学。^[8]为了进一步学习西方科技文化，王征还学习了拉丁文。这些西方传教士所带来的西方科学技术当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当地的生产力水平，推动了陕西科学技术的发展。

不仅如此，基督教会还创办了大量的慈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机构。早在崇祯七年（1634年），陕西的天主教会就创立了仁会，以救饥、给衣、施诊、戒酒、舍旅、葬死、赎虏七事为急务，^[9]其实质就是天主教设在民间的一种慈善团体。在此之后，教会兴办了大量诸如孤儿院、义学等慈善机构。无论教会兴办这些慈善机

^[7] 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志，外事志》225-234页，中国地方志丛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8

^[8] 见陈横著：《泾阳王征传》

^[9] 穆尔（美）：《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郝镇华译，324页，中华书局，1984

构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它为当地的民众提供了一些免费的收容、教育、诊疗等服务，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产生了较为积极的影响。

教会通过传教士的传教和教会学校的教育，向当地的民众传播了西方音乐、科学、文化等方面的知识，在潜移默化之中影响了人们的思想观念。教会医院将西医的诊疗方法传入了陕西，对于人们传统的医疗卫生习惯与观念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此外，教会为了筹集资金、增加收入，也兴办了一些实业机构。如西安信义会兴办的“博爱印刷厂”、安息日会兴办的“三育织布厂”和“三育奶厂”等，这些也对当时的社会生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此外，还有的教会为了吸引群众，组织了大量的文化娱乐活动，丰富了当时的市民生活。如当时的西安市青年会就设有智育部、体育部和群育部。智育部举办有英文、数学、财会等专修班、补习班和夜校，并邀请名人做哲学和科学讲演。体育部设有室内建身场和露天运动场，室内有台球、乒乓球、象棋、围棋等；室外有足球、篮球、排球等，经常举行比赛。群育部则开办寄宿舍、西餐部、中餐部、浴室、电影幻灯等业务。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传播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以及现代的生活方式，对于传统思想和旧有的生活方式起到了改良作用，在当时大大丰富了社会生活的内容。

总而言之，陕西的教堂作为明清之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传入陕西的重要阵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陕西的社会文化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

此外，教堂建筑也是一种宗教精神的象征。这些教堂建筑的存在，使其所在地区具有了特殊的场所精神和文化内涵，对生活在其中的居民具有归属感和认同感，成为人与人之间的精神纽带。

7.4 小结

本章的讨论了陕西教堂建筑在建筑、城市、文化以及社会生活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意义。陕西的教堂建筑的历史发展过程是中国教堂建筑发展史的缩影，在中国建筑史上也具有一定的地位，陕西的教堂建筑也是我们进行建筑史研究的宝贵物证。

教堂是西方建筑传入陕西并于传统建筑融合的重要领域，对陕西建筑尤其是近代以来的建筑造成了技术、观念等多方面的影响，在陕西建筑的近代化历程中起到过极其重要的作用；就其建筑本身而言，陕西现存的教堂建筑也具有其独特的建筑艺术价值；这些教堂建筑都对中西方建筑文化的结合做出的探索，对于今天的建筑设计还是具有启发与借鉴作用。此外还进一步探讨了陕西教堂建筑在城市、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等多方面的意义。

结 语

陕西的基督教堂最早出现于唐贞观年间（公元 635 年），古代基督教首次传入中国，并在长安建造了中国第一座基督教堂。自此之后，随着基督教与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几度兴衰，陕西的教堂建筑也经历了 1300 多年的发展变化过程。特别是明朝末年以来，天主教在陕西的传播；以及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新教大规模的传入陕西，在陕西建造了大量的教堂，其中有一部分保存至今。

据文献记载，最初的教堂建筑都是沿用民房改建或沿用中国旧式房屋。这是因为早期的传教方式都尽量中国化，又以避免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冲突。明清时期的天主教在中国采取了“合儒”的策略，传教士以儒士姿态出现，当时新建教堂或购买私宅改建的教堂大多为“中国式”，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少数正规西方样式教堂。

鸦片战争开埠后，西方传教士大批进入中国，教堂大量出现。与以往避免同中国传统文化冲突的传教政策相反，开埠后西方宗教的传入表现出胜利者的姿态，教堂都明确采用正规西方教堂样式，教堂成为宗教精神的象征。后来一些西方传教士开始设计西式教堂，但初期建造的教堂基本上还是中国厅堂式建筑间杂一些西方风格，实际上多为“中西混合式”的西式教堂。陕西的这些西式教堂，极少经过正规建筑师设计。一般都是由外国传教士自己设计绘图，又为了适应就地取材和采用中国传统的建筑技术而由中国工匠加以修改。初期的西式教堂多为巴洛克式、哥特式和罗马式风格，这显然是受当时欧洲建筑风格的影响。这种教堂的一般特点是：整体的造型比例与构造方式为西式建筑，而细部装修则往往夹杂中国传统建筑手法。

在陕西教堂建筑的部分实例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与国内其他地区的教堂建筑的比较，可以概括出陕西教堂建筑所具有在建筑形式与建筑材料、结构技术方面的特征。陕西明清时期的天主教堂中，应当有相当一部分呈现出巴洛克风格，不过也具有有一些不同与西方巴洛克的特征：揉入中国传统建筑细部；运用传统的材料与工艺；用字匾、楹联表意；表面的巴洛克式风格。基督教新教对教堂的形制要求也没有天主教那么严格。其教堂形式也相对的比较简单。近代以来在陕西建造的基督教新教礼拜堂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西式构图，中国元素；另一种则是较为简洁的现代建筑形式。

随后本文从陕西特殊的文化结构体系、受异域文化影响是一个自觉于不自觉的过程以及外在受异域文化影响而不以改变的传统观念这三个角度探讨了陕西教堂建筑所体现的受异域文化影响的特征及其形成的渊源。陕西是中华民族文明发祥地

之一，历史悠久，传统文化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西方文化从中国沿海登陆经过辽阔的中国领土进入内陆腹地的陕西，其进攻势头已被弱化，不能不对陕西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有所妥协与让步。中西文化两者之间的冲突因此而得以弱化，产生某种微妙的平衡，呈现出一些中西建筑文化互相渗透混杂的特征。体现在教堂建筑上，就是教堂建筑的“本土化”特征。

虽然从主观上来讲，陕西的教堂建筑与陕西当地的传统建筑相遇于某种程度上的民族矛盾的氛围之中，但是从客观上讲，既然是两种不同文化的相遇，就不可避免的要发生相互间的影响。而且，由于这种相遇是西方建筑文化来到传统的中国土壤之上，这种不可避免的影响也是一种自觉与不自觉的过程。中国人虽然接受西方文化，但却常常以中国式的观点看待外来事物。这也许可以归因于民族性。中国人的传统习惯很难改变，就建筑来讲，他们接受了西式建筑，但却并非全盘形的吸收，而是用自己传统的观念重新解释了外来的建筑语言。

本文的最后讨论了陕西教堂建筑在建筑、城市、文化以及社会生活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意义。陕西的教堂建筑的历史发展过程是中国教堂建筑发展史的缩影，在中国建筑史上也具有一定的地位，陕西的教堂建筑也是我们进行建筑史研究的宝贵物证。教堂是西方建筑传入陕西并于传统建筑融合的重要领域，对陕西建筑尤其是近代以来的建筑造成了技术、观念等多方面的影响，在陕西建筑的近代化历程中起到过极其重要的作用；就其建筑本身而言，陕西现存的教堂建筑也具有其独特的建筑艺术价值；这些教堂建筑都对中西方建筑文化的结合做出的探索，对于今天的建筑设计还是具有启发与借鉴作用。此外还探讨了陕西教堂建筑在城市、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意义。

陕西有一部分教堂建筑保存至今，基本保持了初建时的原貌。这些保留下来的教堂建筑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实物依据，因此对陕西教堂建筑的历史沿革、建筑型制和现存状况进行系统而又深入的研究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能性。目前，国内外有关陕西地区教堂建筑的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在专业领域内对陕西教堂建筑的专门性研究目前还属空白。

有鉴于此，陕西教堂建筑的研究可以弥补目前在这方面研究的缺乏，促进这一研究领域中的发展，并对相关领域的研究的发展有所帮助。本课题研究以陕西教堂建筑作为研究对象，不仅只是对陕西基督教堂建筑资料的收集介绍，更重要的是通过研究它们的历史沿革和形制发展状况，概括总结出陕西教堂建筑所具有的一些建筑特征及其渊源，并对陕西教堂的建筑形制进行研究总结，目的在于为陕西教堂建筑的保护与更新提供一些基础性的研究资料。这是建筑史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有助于对陕西建筑发展变化成因及其发展趋向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作者通过对陕西教堂建筑的研究，在本文中得出了以上的一些结论。但是由于时间有限，还有一些问题有待于今后的进一步深入研究。例如在学术研究与历史建筑保护、利用的结合，从建筑学专业人员的学术研究进一步深入为多学科交叉的涉及城市发展进程的综合性研究等方面，都是今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致 谢

本文的研究工作是在我的导师杨豪中教授的悉心指导之下完成的,在论文的选题和研究写作过程中,导师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从论文开始的选题、调研、研究方法的确定,到论文写作过程中论文提纲的推敲、论文结构的调整,导师从宏观上把握,具体布局上掌控,要点上具体指导,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使学生深感受益非浅。在师从先生的三年中,我的收益很大,先生不仅治学严谨,学识渊博,而且为人和善,诲人不倦。先生对我的悉心培养和谆谆教诲也将使我受益终身。

在课题的研究过程中,张似赞教授对论文的选题和研究提出了中肯的建议,是我受益良多。刘临安教授、侯卫东教授、武联教授也对论文的选题和研究内容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在此我要向四位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论文在资料收集、实地调研的过程中,得到了陕西省以及西安市基督教协会和天主教爱国会的大力支持与帮助。特别是王怀仁会长、张冠儒牧师和渠小玲德肋撒提供了无私的帮助,在此向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同时我也要特别感谢陈新、王非、刘超、赵雪亮等同学和朋友,他们在资料收集、实地调研测绘等工作中都曾给我很大的帮助。

特别要感谢的还有我的家人,他们在我的学习和生活上给予了我莫大的支持和鼓励。

在这里,我诚挚的感谢曾经帮助和关心我的老师、同学、家人和朋友,谢谢!

参考文献

- 1、黄心川：《世界十大宗教》 上海，东方出版社，1996
- 2、方豪：《中国天主教史论从》 商务印书馆，1944
- 3、威利斯顿·沃尔克（美）：《基督教全史》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 4、李宽洙：《中国基督教史略》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9
- 5、姚民权、罗伟虹：《中国基督教简史》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11
- 6、阜新平：《基督教犹太教志》（《中华文化通志·第九典·宗教与民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0
- 7、穆尔（美）：《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 郝镇华译，北京，中华书局，1984
- 8、李因信：《西安市基督教会历史简编》 西安市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1988.7
- 9、李伯毅：《陕西省天主教历史述略》 西安政协，No.207,Vol.38, 2002.1
- 10、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志》 中国地方志丛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8
- 11、西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西安市志》 西安：西安出版社，2002.6
- 12、西安地方志馆、西安市档案局：《西安通览》 西安地方志丛书，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9
- 13、陈志华：《外国建筑史》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4.6
- 14、张厚斌：《教堂的起源及演进》 重庆建筑大学学报，No.4,Vol.20, 1998.8
- 15、杨宏烈、杨安：《现代宗教建筑的形制流变》 新建筑，1998.2
- 16、杨秉德：《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3.6
- 17、王绍周：《中国近代建筑图录》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9
- 18、汪坦、藤森照信（日）：《中国近代建筑总览》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3.10
- 19、伍江：《上海百年建筑史（1840~1949）》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7.5
- 20、沙永杰：《“西化”的历程——中日建筑近代过程比较研究》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11
- 21、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教堂建筑二十景》 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6
- 22、吴光祖：《中国现代美术全集 建筑艺术卷》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8
- 23、王世仁：《王世仁建筑历史论文集》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7

- 24、吴焕加、吕舟：《建筑史研究论文集（1946~1996）》 清华大学建筑学术丛书，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
- 25、汪坦：《第一次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讨论会论文专辑》 华中建筑，No.2,1987
- 26、汪坦：《第二次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讨论会论文专辑》 华中建筑，No.3,1988
- 27、汪坦：《第三次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讨论会论文集》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7
- 28、汪坦：《第四次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讨论会论文集》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3.10
- 29、汪坦：《第五次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讨论会论文集》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8.3
- 30、张复合：《中国近代建筑研究与保护（一）》 1998 中国近代建筑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9
- 31、朱永春：《巴洛克对中国近代建筑的影响》 建筑学报，No.3,2000
- 32、杨嵩林：《中国近代建筑复古初探》 建筑学报，No.3,1987
- 33、见弗·孔蒂：《巴洛克艺术鉴赏》 李宗慧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 34、路秉杰：《上海的教堂》 新建筑，1986.3
- 35、倪群：《上海教堂建筑研究》 同济大学硕士论文，1989
- 36、李允禾：《华夏意匠》 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84
- 37、张壁田、刘振亚：《陕西民居》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3.9
- 38、董丛林：《龙与上帝——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 北京，三联书店，1992
- 39、Caleb Carr: 《The Devil Soldier》 Random House New York, 1992
- 40、Linda Cooke Johnson: 《Cities of Jiangna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 41、Tress Johnston and Deke Erh: 《The Last Colonies, Western Architecture in China Southern Treaty Ports》 Hong Kong Old China Hand Press, 1998

插图目录

插图名称	图片资料来源
图 3-1, 大秦寺塔	《陕西省志》
图 3-2,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陕西省志》
图 3-3, 西安市基督教会分布图	《西安基督教会历史简编》
图 4-1, 周至教区户县围棋寨天主教堂	陕西天主教爱国会
图 4-2, 延安市桥儿沟天主教堂立面	陕西省古建研究所
图 4-3, 三原县城天主教堂	自摄
图 4-4, 凤翔县城西街天主教堂	陕西天主教爱国会
图 4-5, 渭南教区南白圣母无染原罪堂	陕西天主教爱国会
图 4-6, 榆林教区靖边县东坑乡硬地梁天主堂	陕西天主教爱国会
图 4-7, 西安市五星街天主教堂正面外观	自摄
图 4-8, 西安市五星街天主教堂侧面外观	自摄
图 4-9, 高陵县通远坊天主教堂内景	自摄
图 4-10, 高陵县通远坊天主教堂平面	自绘
图 4-11, 高陵县通远坊天主教堂正面外观	自摄
图 4-12, 耶稣会教堂	《外国建筑史》
图 4-13, 三原县城基督教堂原貌	三原县基督教会
图 4-14, 三原县城基督教堂现状外观	自摄
图 4-15, 三原县城基督教堂平面	自绘
图 4-16, 三原县城基督教堂内景	自摄
图 4-17, 西安市东新巷礼拜堂正面外观	自摄
图 4-18, 西安市东新巷礼拜堂屋架与柱头节点	自摄
图 4-19, 西安市南新街礼拜堂入口	自摄
图 4-20, 西安市南新街礼拜堂钟楼	自摄
图 5-1, 三原县城天主教堂	自摄
图 5-2, 宜川县英旺基督教堂	陕西省基督教会
图 5-3, 上海敬一堂	《“西化”的历程》
图 5-4, 澳门大三巴教堂	《“西化”的历程》
图 5-5, 四川省彭县白鹭乡天主教堂	《中国近代建筑复古初探》
图 5-6, 上海第二代圣三一堂	《上海百年建筑史》
图 5-7, 北京西什库天主教堂北堂外观	《中国近代建筑图录》

图 5-8, 上海徐家汇天主堂外观	《上海百年建筑史》
图 5-9, 青岛圣弥爱尔教堂外观	《中国近代建筑图录》
图 5-10, 上海洋泾浜天主堂	《上海百年建筑史》
图 5-11, 上海第一代圣三一堂	《上海百年建筑史》
图 5-12, 天津望海楼天主堂	《中国近代建筑图录》
图 5-13, 上海董家渡教堂正立面	《上海百年建筑史》
图 5-14, 北京天主教南堂正立面	《中国近代建筑图录》
图 5-15, 佘山天主教堂外观	《上海百年建筑史》
图 5-16, 天津老西开天主堂	《天津近代建筑》
图 5-17, 哈尔滨中央寺院	《中国近代建筑图录》
图 5-18, 上海东正教堂	《中国近代建筑图录》
图 5-19, 上海鸿德堂	《上海教堂建筑二十景》
图 5-20, 北京救世军教堂	《中国近代建筑图录》
图 5-21, 三原县城天主教堂内部空间	自摄
图 5-22 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内部空间	自摄
图 5-23, 西安市五星街天主教堂外观	自摄
图 5-24, 西安市五星街天主教堂细部纹饰	自摄
图 5-25, 董家渡天主堂外观	《中国近代建筑图录》
图 5-26, 上海佘山天主教堂外观	《上海教堂建筑二十景》
图 5-27, 上海东正教堂	《上海教堂建筑二十景》
图 5-28, 上海圣尼古拉斯教堂	《上海教堂建筑二十景》
图 5-29, 北方抬梁式大木构件	《陕西民居》
图 5-30, 西式三角屋架	《“西化”的历程》
图 5-31, 三原县城天主教堂内景	自摄
图 5-32, 高陵县通远坊天主教堂窗洞	自摄
图 5-33, 高陵县通远坊天主教堂室内	自摄
图 5-34, 三原县城基督教堂木屋架	自摄
图 5-35, 三原县城天主教堂内景	自摄
图 5-36, 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内景	《上海教堂建筑二十景》
图 7-1, 三段式传统建筑立面构图	《中国古代建筑史》
图 7-2, 渭南教区南白圣母无染原罪堂	陕西天主教爱国会
图 7-3, 西安五星街天主教堂立面细部	自摄
图 7-4, 西安市东新巷礼拜堂窗洞	自摄